

江戸時期(1603-1868)明清

詞籍的東傳與接受——

以《詞學全書》為中心*

余佳韻**

摘要

本文以清初詞學典籍《詞學全書》於江戸時期在日本的傳播與接受為線索，考察日本江戸時期詞學接受的一面。首先簡述江戸時期漢籍輸入的背景以及明清詞籍的傳入類型。《詞學全書》為其中傳來紀錄最多，且影響江戸文人最深的詞籍。其次，以現存的唐船持渡書紀錄與相關文獻為基礎，釐清《詞學全書》版本與相關書籍紀錄。接著著眼於江戸中後期文人如三浦梅園等人對《詞學全書》的閱讀與引用狀況，以及《詞學全書》在昌平坂學問所內部的閱讀至成為儒者漢學基礎素養的變化，觀察詞體在江戸中後期逐步為文人認識與接受的過程。希冀通過梳理《詞學全書》此一兼具詞學知識全集與填詞指引的書籍在江戸詞學在接受概況，觀察江戸詞學發展的一個側面，以為明治、大正以降日本詞壇蓬勃發展的前緣線索。

2024年10月6日收稿，2025年2月13日修訂完成，2025年8月8日通過刊登。

* 本文為國科會計畫「江戸時期(1603-1868)唐船持渡書與日本詞學受容研究」(111-2410-H-005-049-)之部分研究成果。論文初稿曾於「2023中央研究院明清研究」國際學術研討會(臺北：中央研究院，2023.12.13-15)宣讀，文章撰寫期間，蒙日本交流協會補助，以及兩位匿名審查人細心閱讀並慷慨賜予寶貴意見，使本文論述更臻完備，特此致謝。又承日本公文書館允許使用其所藏漢籍影像資料，謹致謝忱。文中如有任何違誤或疏漏，文責當由本人自負。

** 作者係國立中興大學中國文學系副教授。

關鍵詞：詞學全書、江戶時期、詞籍、詞學受容、唐船持渡書

一、前言

中日文化交流歷來以船舶運輸與貿易往來為主要途徑，其中又以漢籍之東傳，對日本文化的接受與形塑影響尤為深遠。自平安時期以降，《文選》與《白氏文集》等漢籍廣為流傳，足見其時對中國文學經典的重視；藤原佐世（847-898）所編《日本國見在書目錄》、¹戰國時代公卿日記中關於「新渡唐本」的記載，²亦可視為早期漢籍輸入日本之具體證據。自寬平六年（894）日本官方停止遣唐使以來，中日交流逐漸轉為以民間私人貿易為主。即使在鎌倉（1185-1333）、室町（1336-1573）或政治局勢動盪的戰國時期，仍有「入宋僧」與「入元僧」前往中國，攜回佛教內典、禪宗義理及宋代儒學相關典籍，與刻板印刷術，成就了十四、十五世紀的鎌倉及京都五山文化。³整體而言，自唐宋以降，透過海路渡海傳入之漢籍與文物，對日本漢文學與文化體系的發展產生深刻而持續的影響。

江戶以降，隨著造船與航海技術的成熟，中日商業貿易往來更趨頻繁。即便清初曾一度因為南明政權的問題而中斷交流，然而隨著疆域的統一與清政權逐步穩定，⁴以及康熙二十三年（1684）展海令的頒布，渡日貿易的唐船數量急劇增加。相對安穩的經貿環境及明清書籍刊刻印刷的發

1 「白居易（772-846）在會昌五年（845）所寫的〈白氏長慶集後序〉中已經提到日本、新羅等地傳寫的白集本子。而據日本《文德天皇實錄》記載，承和五年（838）：『因檢校大唐人貨物，適得元白詩筆。』……根據《江談抄》的說法，嵯峨帝時已有『白氏文集一本渡來，在御所龍被秘藏。』諸如此類的記載甚多，而隨著白居易文學的傳播，《白氏文集》亦逐漸取代《文選》而成為平安文人必讀的經典。張伯偉、卞東波，《風月同天：中國與東亞》（南京：江蘇人民出版社，2017），頁 215-216。

2 （日）大庭脩，《江戶時代における唐船持渡書の研究》（吹田：關西大學東西學術研究所，1967），頁 10-11。

3 嚴紹臺，《日本文化研究》（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2021），頁 198。（得到電子書頁碼）

4 （日）岩井茂樹，〈歷史的展開〉，收入（日）荒野泰典、（日）石井正敏、（日）村井章介編，《近世的世界の成熟》（東京：吉川弘文館，2010），頁 48。

達更加快了書籍東傳日本的腳步。⁵ 十八世紀中葉時，筆、墨、書籍等帶有高度文化氣息的商品輸入數量達到高峰。⁶ 從永積洋子《唐船輸出入品數量一覽：1637-1833年：復元唐船貨物改帳・歸帆荷物買渡帳》、⁷ 長崎書物改役向井家的《船舶載來書目》，以及大庭脩《江戶時代における唐船持渡書の研究》等書所記載的江戶時期中國商船載往日本書籍數量，⁸ 不難想見江戶時期漢籍輸入的數量與類型之龐雜多樣。⁹ 現存較為完整的

-
- 5 相關論述可參見：劉序楓，〈從「韃靼」到「大清」：十七、八世紀日本幕府對清朝認識的建構〉，收入劉序楓主編，《亞洲海域間的信息傳遞與相互認識》（臺北：中央研究院人文社會科學研究中心，2018），頁 97-142。
 - 6 永積洋子曾歸納唐船輸入品的整體趨向，指出「自鎖國體制完成後，十七世紀的輸入品主要為生絲，至十八世紀中期為絹織物，其後雖轉以藥材為主，但染料與砂糖為始終不變的重要配角。十八世紀中期，輸入品的種類最多，從這個時候開始，筆、墨、書籍等高度文化氣息的商品大量輸入。至十八世紀末，除去漢方藥以外，無法以國產品支應的物品漸少，輸入品以佳品與珍稀品為主。」（日）永積洋子，《唐船輸出入品數量一覽：1637-1833年：復元唐船貨物改帳・歸帆荷物買渡帳》（東京：創文社，1987），頁 29。
 - 7 據永積洋子《唐船輸入品數量一覽：1637-1833年：復元唐船貨物改帳・歸帆荷物買渡帳》的資料，早在正保三年（1645），福州船已有載運漢籍的船載紀錄，其後漳州船、安海船（即福州船）與南京船等亦陸續加入漢籍貿易的行列。然而，在船載貨物列表中，漢籍數量相較於其他貨品並不算多。儘管如此，「自 1637 年到 1833 年間，僅從乍浦港運往日本的各種繪畫就有 62586 幅，各種毛筆 235198 支，……書籍 724 箱（另有 15129 冊，若干組，其中包括《紅樓夢》9 部 18 套）」的統計數據，即可略窺當時漢籍輸入的規模與概況。引自馮佐哲，〈乍浦港與清代中日貿易和文化交流〉，收入朱誠如、王天有主編，《明清論叢》第 2 輯（北京：紫禁城出版社，2001），頁 254。
 - 8 據長崎書物改役向井富的《船舶載來書目》，從 1693 年至 1803 年之間，清朝商船運至長崎的典籍共 4781 種。大庭脩亦提到 1714-1855 年間，中國商船載往日本的書籍計有 6163 種，57204 部。見（日）大庭脩，《江戶時代における唐船持渡書の研究》，頁 52-53、210-211。
 - 9 「據《唐蠻貨物帳》的記錄，於寶永 6 年（1709）至正德 3 年（1713）期間載有書籍的船隻共有 14 艘，數量從 1 箱到 93 箱不等，而載有書籍的船隻僅有南京船和寧波船。如正德元年（1711）54 艘中國船隻中僅有 6 艘載有書籍。其中南京船與寧波船各占 3 艘。」同樣提到江戶時期的漢籍僅為附隨於船舶貿易之下的商品，並非主要的貿易標的。引文見章宏偉，〈長崎貿易中的清宮刻書——以《船載書目》為中心〉，收入劉再聰主編，《中西交通與華夏文明》（北京：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2019），頁 651。（得到電子書）

唐船持渡書的資料，除《江戸時代における唐船持渡書の研究》外，宮內廳書陵部藏《舶載書目》亦是重要的參考來源。前者所收錄的內容較為龐雜，包括了齎來書目、大意書等材料。由於橫跨的時間線段較廣，材料來源較為多元，頗能呈現江戸時期漢籍大致的傳入概況；後者所記載的年分起於元祿七年（1694），迄於寶曆四年（1754），按時間順序逐一載明書名、套數、卷數，解題等，亦不時有校刊者或序跋等信息，反映了江戸初期的漢籍受容情形。¹⁰ 惟需留意的是，書籍的輸入雖然在文化傳播層面意義重大，然而在全體貿易品項中所占比重仍低；主要運載書籍的船隻——南京船與寧波船，於江戸時期前半運載渡來漢籍數量仍為稀少。¹¹

根據現存舶載文獻紀錄，江戸時期傳入的明清詞籍大致可分為以下幾類：第一、以總集附錄形式傳入者。如明人徐師曾《文體明辨》附錄之詞譜、¹²《詞苑英華》所收錄的《詩餘圖譜》等。¹³ 第二、以文人全集或別集形式傳入者。如《西河全集》、《曝書亭集》、《湖海樓全集》、《王漁洋全集》、《林蕙堂全集》、《屈翁山詩集（附詞）》、《隨園三十種》等。其中《隨園三十種》收錄的書目較為繁雜，在詩文以外，還包括了納蘭性德的《飲水詞鈔》、汪世泰所輯的《七家詞鈔》、袁通《捧月樓詞》與顧翰《綠秋草堂詞》等詞作別集。第三、以詞作總集或選集形式傳入者。如《宋名

10 域外漢籍珍本文庫編纂出版委員會編，《域外漢籍珍本文庫》第 4 輯·史部第 23 冊（重慶：西南師範大學出版社，2014），提要。

11 （日）大庭脩，《日中交流史話：江戸時代の日中關係を読む》（大阪：燃燒社，2003），頁 42。

12 張仲謀曾提到明人徐師曾的《文體明辨》附錄收錄「詩餘」九卷（清初沈雄《古今詞話》稱之為《詞體明辨》），共收錄詞調 332 調，424 體，例詞 573 首；前為平仄譜，後為例詞，具有詞譜之性質。在清代影響頗大的《嘯餘譜》，亦為程明善雜取各書纂輯而成，其中《詩餘譜》部分正是完全照搬徐氏的《詞體明辨》。詳見張仲謀，〈論徐師曾《詞體明辨》的詞譜性質：兼論《嘯餘譜》與《詞體明辨》之關係〉，《西北師大學報（社會科學版）》45.5(2008.9): 51-56。

13 毛晉汲古閣《詞苑英華》收錄有《花菴絕妙詞選》、《中興絕妙詞選》、《草堂詩餘》、《花間集》、《尊前集》、《詞林萬選》以及《詩餘圖譜》。並有天明三年（1783）與天明六年（1786）各一次，以及寬政六年（1794）兩次的渡來紀錄。（日）大庭脩，《江戸時代における唐船持渡書の研究》，頁 253、255、419 及 730。

家詞》、¹⁴《御選歷代詩餘》、《古今詞選》、《詞綜》、《歷代名媛詩詞》、《東白堂詞選》等。第四、以詞學總集或叢書型態傳入者。以清初康熙年間查繼行編輯的《詞學全書》與嘉道時期秦恩復編輯的《詞學叢書》為代表。其餘零星的單本詞集，多為乾隆以前文人所著，數量有限。根據《舶載書目》記載，當時傳入日本的漢籍多為江浙文人著作，或由江南書肆刊刻，其中詞籍也以清初浙西文人的作品為主。究其原因，主要在於江南地區自古為學術重鎮，學風鼎盛，文人著作豐富。加之明清以來江南商業繁榮，書肆林立，出版業興盛。從地緣與商品流通的角度來看，乍浦港（今浙江嘉興）作為唐船的主要出發港，商人因地緣之便，在江南購入漢籍作為貿易商品，亦是自然且合理的商業行為。而在眾多詞籍中，又以《詞學全書》多次傳入日本且在當地流傳範圍廣泛，而具有特別的研究價值。

學界利用《舶載書目》的相關研究多以小說為主，多是從書目材料歸納江戶時期中國傳奇小說與戲曲的輸入情形，並構建江戶時期文人對中國傳奇戲曲的接受概況。日本方面，是以長澤規矩也的〈再び伝奇四十種と舶載書目との関係について〉及青木正兒〈《御文庫目録》中の支那戯曲〉為代表。中文學界早年則有孫楷第《中國通俗小說書目》卷四引用《舶載書目》考證小說《平山冷燕》的作成時期。¹⁵近年周健強〈江戶時期中國小說傳播的階段特徵——以《舶載書目》為中心〉一文，從小說傳播史的概觀角度，分類《舶載書目》的小說輸入階段特徵，歸納江戶時期中國文言及白話小說於漢籍中所占的輸入比例外，同時指出小說漢籍運載傳入的高峰期恰與荻生徂徠和伊藤東涯等江戶儒學者嗜讀小說的時期重疊。¹⁶相對於此，江戶時期的詞籍接受研究仍在起步階段。與本文直接相關者，為陳竺慧〈昌平坂學問所における舶来書籍の受容〉。文中以日本國立公文書館館藏的昌平坂學問所詞籍為中心，初步解明詞籍版本與其上批點標記

14 如公文書館館藏，佐伯藩主毛利高標獻上的《宋名家詞》以及名古屋蓬左文庫所藏，明正天皇於寬永十三年（1636）年自中國購入的《宋名家詞》。

15 孫楷第，《中國通俗小說書目》（北京：作家出版社，1957），頁133。

16 周健強，〈江戶時期中國小說傳播的階段特徵——《舶載書目》為中心〉，《中國文化研究》2019.1(2019.2): 169-180。

的意義。惟因題目所限，文中主要圍繞詞籍的介紹與考證，未能針對特定書籍的接受情形與影響層面進行較全面的研究。¹⁷ 劉宏輝《詞學文獻東傳與日藏詞籍》提及《詞律》於江戶時期東傳時也提到了《詞學全書》的傳入。惟其說大多延續神田喜一郎之論外，部分論析亦尚有補充空間。¹⁸

文學體類的興盛離不開長期的積累與實踐，以及當時文人一定數量的創作成果。漢籍作為江戶文人重要的知識來源與載體，不僅是鎖國時期日本文人認知世界的主要途徑，其輸入的類型更深刻影響了江戶文人對漢學知識體系的視野與建構。從十七世紀末（元祿年間，約 1688）至十九世紀末（慶應年間，至 1868）期間輸入的唐船漢籍，恰好反映了日本對外來知識（蘭學除外）的漢學接受概況。因此，若要追溯江戶末期至明治初期填詞風氣興盛的源頭，釐清江戶文人對詞體的認識是通過哪些詞學典籍積累與建構而成，並進一步探討這些詞籍與舶載書目間的關聯，以及詞籍傳入對江戶文人填詞習得過程與詞學傾向的影響，實為首要之務。

《詞學全書》是江戶時期流傳最廣的詞學典籍，不僅見於唐船持渡書的渡來紀錄，江戶中期以降的儒者著述與書信中也多有提及。此外，《詞學全書》也是江戶至明治時期日本官方與私人文庫中現存收藏數量最多的詞學典籍。考察《詞學全書》在江戶時期的接受情況，即能約略勾勒出日本江戶時期詞學發展的脈絡。本文以《舶載書目》等唐船持渡書的相關紀錄為基礎，探討《詞學全書》在江戶時期的接受脈絡。首先，說明《詞學全書》的成書性質與編纂目的；其次，釐清唐船持渡書與日本現存《詞學全書》版本的相關論述；最後透過江戶中後期儒者文人對《詞學全書》的接受，探討詞體逐步為日本文人所認識與創作的過程。誠然，無論是中國文學史或日本漢文學，皆以詩文為主流；質輕徑狹、以婉約為宗的詞體，往往被文人視為小道。希望藉由梳理《詞學全書》在江戶時期的發展脈絡，補充學界對江戶詞學的研究空缺外，尚能進一步具體掌握明治以降日本填詞興盛的前緣背景。

17 陳竺慧，〈昌平坂學問所における舶来詞籍の受容〉，《待兼山論叢・文学篇》55(2021.12): 1-23。

18 劉宏輝，《詞學文獻東傳與日藏詞籍》（北京：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2020），頁 130-133。

二、《詞學全書》的成書與東傳背景

詞體在歷經元明的沈寂之後，於清初展露了中興之態。當時文人有鑑於明代詞樂佚失，明代詞家少而不工，詞作疏於音律的弊病。¹⁹ 在追溯詞體源流至詩騷風雅，以推尊詞體的同時，清初文人也重視詞體的音聲樂律，熱衷於考校前代詞學譜律與詞譜編選。康熙年間成書的萬樹《詞律》、吳綺《選聲集》、官方的《欽定詞譜》，甚至《詞學全書》所收賴以邠的《填詞圖譜》，均可視為此一風潮下的代表著作。

《詞學全書》為查繼超（生卒年不詳）於康熙十八年（1679）所編，收錄了毛先舒《填詞名解》、王又華《古今詞論》、賴以邠《填詞圖譜》與仲恆《詞韻》而成，以供後人學詞之用。查繼超出身清初浙江海寧的文學世家，族內除另有書法家查昇（1650-1707）與詩人查慎行（1650-1727）等著名文人外，與查家交好的同里詞人陸嘉淑（1620-1689）也與朱彝尊（1629-1709）、曹溶（1613-1685）、毛先舒（1620-1688）等人均有往來唱和，²⁰ 為清初江南地區重要的文學交遊網絡。綜觀《詞學全書》所收之作者，如毛先舒、賴以邠（生卒年不詳）出身浙江仁和（今屬杭州），王又華（生卒年不詳）出身浙江錢塘，皆與浙西有地緣關係外，其中所收錄的詞譜詞韻等書籍，也反映了浙西詞派在推尊詞體、論詞以姜、張為宗，崇尚清空醇雅的詞學主張外，重視詞體聲韻協律的音樂性之面向。在這一點上，《詞學全書》的成書可以說是清初江浙一地文人對詞體的認識以及填詞規範的總結。

19 如錢允治〈國朝詩餘序〉云：「騷壇之士，試為拍弄，才為句掩，趣因理湮，體段雖存，鮮能當行。」（明·錢允治輯，《類編箋釋國朝詩餘》，收入續修四庫全書編纂委員會編，《續修四庫全書》第1728冊〔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2〕，頁212）。明末清初的陳子龍（1608-1647）指出明代曲學的發達導致了詞體的衰退，他說：「元濫填詞，茲無論已……且南北九宮既盛，而綺袖紅牙不復按度，其用既少，作者自希，宜其鮮工也。」都是批判明人填詞昧於音律、粗糙濫製的流弊。（清·陳子龍，〈幽蘭草詞序〉，收入彭志輯校，《明人詞籍序跋輯校》〔杭州：浙江大學出版社，2021〕，頁347-348）。

20 陳水雲，〈被折疊的詞史段落：康熙末至乾隆初的浙西詞派與浙西詞壇〉，《嶺南學報》16(2022.12): 34。

查培繼（1615-1692）序言即揭示了《詞學全書》的編選動機。他說：

碧月夜滿，瓊樹朝新，六季風華，沿流增飾。填詞之家，染毫扞翰，爭一字之奇，競一韻之巧，幾於江皋拾翠，洛浦探珠矣。然味厥源流，或乖聲韻，識者病之。此余家仲隨菴偕毛氏、賴氏、仲子、王子有詞學之刻，釐辨精確，用以鼓吹騷壇，厥功匪渺。漢初古樂凋散，高惠文景，及武帝時，已無可考。太史公作樂書，僅述《樂記》之言，後人以爲揣摩影響，少所發明。試披繹是書，吾知其虞夔拊石，衛曠調鐘，太始元音，多得不傳之秘，烏可忽諸。²¹

《詞學全書》的編成是有鑑於當時詞壇「味厥源流，或乖聲韻」，或對詞體源流無所認識，或與填詞製曲不合平仄聲韻，因而希望透過此書的編選提供學詞之人得以依循的法則，解明詞學名詞源流，譜式韻律以及前人詞說，藉以「鼓吹騷壇」，提倡填詞風氣。最後以漢初古樂凋敝散失而後人得以依據司馬遷的紀錄揣摩前人樂章，對應到詞樂佚失的清初，亦可得出披閱尋繹《詞學全書》的篇章內容，按譜填詞、循序漸進，窺得前代詞樂（即樂音）之秘的輪廓，呼應了清初復古與尊體的風潮。

《四庫全書總目提要》曾批評「《詞學全書》十四卷，是編輯於康熙己未（1679）。以毛先舒《填詞名解》四卷、王又華《古今詞論》一卷、賴以邠《填詞圖譜》六卷，《續集》一卷，《詞韻》二卷，彙為一編，無所發明考正。」²²即便《詞學全書》內容僅為彙整前人所論，未有創發之處，但《詞學全書》作為一綜合性的詞學總集，不僅是「清初詞壇『重律』與『尚法』的重要觀念」之表彰，²³更提供了清代文人在詞樂佚失的限制下，倚聲填詞的入門基礎。綜觀《詞學全書》所收錄的內容，《填詞名解》與《古今詞論》各具特色：前者為整理唐宋詞牌的來源與出處，提供相關說解；後者則搜羅歷代詞論與詞評，為學人勾勒出詞牌起源與詞體風格流變

21 清·查繼超輯、吳熊和點校，《詞學全書》（北京：書目文獻出版社，1986），頁 10。

22 清·永瑤等著，《四庫全書總目提要·集部詞曲類存目》第 40 冊（上海：商務印書館，1931），頁 190。

23 陳水雲，《清代詞學觀念史論》（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2024），頁 138。

的基本輪廓。與《嘯餘譜》在單字下標明可平可仄的標記方式不同，《填詞圖譜》承襲了《詩餘圖譜》的體例，以黑白圈標注平仄，更易於理解與使用。此外，《嘯餘譜》雖收錄了詞曲兩種文類，內容龐雜；而《填詞圖譜》雖不及其他大型詞譜或詞律書籍的收錄廣泛，但其收錄的詞牌已足以滿足一般文人填詞的基礎需求。《詞韻》則為填詞的韻部規範，以避免出韻之誤。

要之，《詞學全書》兼具詞體知識總集與填詞參考指引的性質，正好為江戶時期對詞體興趣盎然卻不得其門而入的日本文人提供了系統且完備的詞學知識與學習途徑，成為繼《花間集》、《草堂詩餘》與《詩餘圖譜》之後，對日本填詞史影響最為深遠的詞學典籍。

三、《詞學全書》的渡來與受容

江戶文人受明清學術影響頗深，詩壇或為尊唐，如荻生徂徠（1666-1728）、木下順庵（1621-1699），或為崇宋，如釋六如、市河寬齋（1749-1820），甚至連明清詩論都成為了江戶文人立派爭衡的論辯對象。²⁴ 相對於江戶詩壇百花齊放的論述盛況，詞體在江戶中後期被文人廣泛認識之前，關注者頗為寂寥。在《詞學全書》以外，持渡書紀錄亦有不少標明平仄、句式與韻律的譜律書籍傳入。如元祿十五年（1702）與天保十二年（1841）各有一次渡來紀錄的《嘯餘譜》，²⁵ 以及在江戶初中期以《詞苑英華》及《文體明辨》的附錄傳入的張綖《詩餘圖譜》。清人人萬樹的《詞律》也在寶曆四年和天明二年（1782）分別有兩次輸入紀錄。即便此時亦

24 松下忠《江戶時代的詩風詩論——兼論明清三大詩論及其影響》奠基於過往江戶詩學之分期與詩風特色之基礎，於尊唐崇宋風潮之外，進一步補充明代詩學對江戶詩人之影響，詩學風潮之轉變與代表人物。書中雖未考述此種風潮之變化與唐船持渡書之關聯，然而從江戶時期大量明清文人，如李攀龍的《唐詩選》、王士禛《唐賢三昧集》等人的詩集或選集的傳入來看，大抵亦能推知唐船持渡書對江戶詩壇風氣的影響。詳細討論可參見（日）松下忠著，范建明譯，《江戶時代的詩風詩論——兼論明清三大詩論及其影響》（北京：學苑出版社，2008），頁 5-9。

25 據舶載書目的紀錄，《嘯餘譜》的渡來雖晚於《詞學全書》，然而從日本國立公文書館

有伊藤東涯（1670-1736）的《詩餘圖譜》寫本與零星的文人抄本，惟整體而言，詞體並未受到文人廣泛關注。²⁶

現今可見《詞學全書》最早傳入日本的紀錄為元祿七年，即康熙三十三年。《舶載書目》第一冊《詞學全書》條日記有：「《詞學全書》一部八本，東海查王望鑑定。全篇辨定歌曲詩賦等平仄用韻，法古人之論，解詞曲ノ明解等ノ法。」²⁷ 條目內容雖然沒有全數列出四本書名，但已經簡要地概括了全書是由平仄用韻、古人詞論與解明詞調由來等部分組成。其次為《舶載書目》第九冊，正德元年（1711）的紀錄，條目記載：「《詞學全書》（旁有一行黑字：『又名《填詞圖譜》』），十本十五卷（中略）序康熙十八年（1679）查培繼。」²⁸ 最後是《舶載書目》第十五冊，享保十年（1725）的條目載有：「《詞學全書》七本十四卷，序康熙十八年查培繼題。」²⁹ 後兩者除登載書名以外，也詳細記錄了書籍卷數。請見表一如下：

所藏的兩部萬曆四十六年（1619）序刊本《嘯餘譜》，其中一部即是林羅山之舊藏。《嘯餘譜》在《詞學全書》之前已傳入日本，蓋無疑慮。

- 26 天理大學附屬圖書館所藏之伊藤東涯（1670-1736）的《詩餘圖譜》寫本，原為古義堂藏書。其上有「寶永戊子（1708）之春寫」字樣。萩原正樹以為此伊藤之寫本雖與《詞苑英華》內容大抵相同，卻可能出自與《詞苑英華》不同系統之刊本。至少在江戶初期至中期這段期間，多種《詩餘圖譜》刊本已經傳入日本。從《寶曆書籍目錄》記載《詩餘圖譜》出版預定一事，可知不僅限於抄寫這些唐本的人，而有可能是期待《詩餘圖譜》翻刻本出版的人已有了一定的數量。（日）萩原正樹，〈國內所藏稀見《詩餘圖譜》三種考〉，收入氏著，「詞譜」及び森川竹溪に関する研究（京都：中國藝文研究會，2017），頁 55-57。
- 27 （日）大庭脩編，《宮內廳書陵部藏：舶載書目附解題》第 1 冊（京都：同朋舍，1972），頁 24。
- 28 案：《詞學全書》雖收有《填詞圖譜》一書，但並未有過「又名《填詞圖譜》」的說法。此處或為書物改抄寫時的違誤。（日）大庭脩編，《宮內廳書陵部藏：舶載書目附解題》第 9 冊，頁 18-19。
- 29 這裡雖然載明七本十四卷，然如對照總日記載：《填詞名解》四卷、《古今詞論》一卷、《填詞圖譜》六卷，《填詞圖譜續集》三卷，以及《詞韻》兩卷，共十六卷。應為撰寫時的訛誤。（日）大庭脩編，《宮內廳書陵部藏：舶載書目附解題》第 15 冊，頁 8-9。

表一 大庭脩整理，宮內廳書陵部所藏《舶載書目》

冊數・出處	渡來時期	本數・卷數
第一冊	元祿七年（1694）	一部八本
第九冊	正德元年（1711）	十本十五卷
第十五冊	享保十年（1725）	七本十四卷

另外，大庭脩《江戶時代における唐船持渡書の研究》的資料篇亦有《詞學全書》的渡來紀錄。³⁰請見表二：

表二 《江戶時代における唐船持渡書の研究》所收記載

舶載紀錄・出處	渡來時期	本數・卷數
商船載來書目・志字號	元祿七年（1694）	一部八本
齎來書目・天理圖書館藏	享保二十年（1735）	一部計一套
舶來書籍大意書・ 內閣文庫藏	寶曆四年（1754）	一部一套六本
《唐本類書考》	寬延四年（1751）	全部十五卷

上表中元祿七年的《商船載來書目》與天理圖書館藏，享保二十年（1735，即雍正十三年／乾隆元年）《齎來書目》所載的《詞學全書》，兩者皆為康熙刊本蓋無疑義。寶曆四年舶來書籍大意書的《詞學全書》條目係以候文寫成，逐一詳述序文與各書的內容摘要。³¹從最後「康熙

30 在大庭脩的研究成果之外，現藏於縣立長崎圖書館的《明和調方記》亦載有《詞學全書》的渡來紀錄。《明和調方記》原為無標題之書冊，內容以明和至安永年間（1764-1781）為中心，藉由備忘錄的形式記述從長崎下標的輸入品運送至京坂販賣的交易方式、商業慣習為始，至長崎貿易百般事項，假以「《明和調方記》」之名。由於部分內容參雜了天明、寬政年間的記述，與文化十二年（1815）的補記，整體成書年代大抵落於明和至文化之間。其中收錄明和元年（1764）至天明七年（1787）約二十年間的宿町（住宿）與相關中國人名（「唐船宿町類」）及由中國輸入的漢籍列表（「唐書物凡例號附」），亦提供了清代漢籍渡來的概況。《明和調方記》所載的《詞學全書》渡來年代約略在江戶中期的明和元年（1764）至天明七年（1787）之間。從年代看來，是最有可能為乾隆刊本的《詞學全書》。可參照（日）長崎縣史編纂委員會編，《『長崎県史』史料編第4》（東京：吉川弘文館，1965），頁7、436。

31 陳竺慧〈昌平坂學問所における舶來詞籍の受容〉文中提及昌平坂學問所（即現公文書館）收錄之《詞學全書》的版式資訊。文中推論寶曆四年（1754）之大意書所載的《詞學全書》與現今公文書館所藏為同一的可能性頗高。然如對照大意書之紀錄，

十八年ノ刊ニテ御座候」的記載，可知亦為康熙刊本。³² 可以說，現在持渡書紀錄有案的《詞學全書》均屬於康熙十八年刊本，而非乾隆十一年（1746）。³³

其次為《唐本類書考》所載的《詞學全書》年代。神田喜一郎《日本填詞史話》曾云：「寬延四年（1751），也就是寶曆元年，平安的書林白（案：應為『向』）榮堂主人所編纂的《唐本類書考》也著錄了《詞學全書》，這也是十分值得注意的事實。……最初出版刊行是在乾隆十一年（1746），我國當時是延享四年（應為三年——譯者注）。刊行後五年，便很快通過海上船舶傳入我國，這自然是當時我國一部分讀書人，對此書熱心追求的結果。」³⁴《唐本類書考》為編者向榮堂主人有鑑於「近年明清之書，由長崎渡來者，數量直如恆河沙數，難以計量」，且即便在元祿十七年（1704）已有一色時棟（1673-1744）為家塾之使用目的所編成之「二酉洞」漢籍類書目錄，惟內容粗略不備，不敷使用，進而催生了《唐本類書考》的編成。³⁵ 然而《唐本類書考》的《詞學全書》條目並未提及版本訊息，僅載：「賴以頒（案：為『邠』之誤）損菴著。《填詞名解》四卷、《古今詞論》一卷、《填詞圖譜》上下二卷、《填詞圖譜續集》上下二卷、

寶曆四年的《詞學全書》為康熙刊本，公文書館則為乾隆刊本。且渡來書籍大意書的製作直至寶曆六年（1756）六月後才簡化。從而，大意書所載與公文書館藏本兩者恐非同一。陳竺慧，〈昌平坂學問所における舶來詞籍の受容〉，《待兼山論叢・文學篇》55(2021.12): 11。又，劉宏輝《詞學文獻東傳與日藏詞籍》同樣提到「《舶來書籍大意書戌番外船》著錄此書為康熙十八年（1679）年刊本，但實際上極可能是乾隆十一年（1746）年世德堂的重刻本。」然作者此說僅為推測，並無其他佐證，故本文不採。劉宏輝，《詞學文獻東傳與日藏詞籍》，頁 131-132。

32 (日) 大庭脩，《江戸時代における唐船持渡書の研究》，頁 335。

33 現今可見的康熙十八年刊本《詞學全書》，為《四庫全書存目叢書補編》所收錄的北京大學館藏相同。《舶載書目》所記載的《詞學全書》版本，與《四庫補編》相同的可能性頗高。

34 (日) 神田喜一郎著，程郁綴、高野雪譯，《日本填詞史話》（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2000），頁 82。

35 原文序云：「近年明清ノ書崎港ニ航致スル部数直ニ洄沙ヲ計フルヨリ難シ前ニ一色時棟ノ編メル類書目錄アリトイヘトモ甚略疎ニシテ備ハラス。」(日) 向榮堂主人輯，《唐本類書考》卷上（京都：山田三郎兵衛，寬延四年〔1751〕，早稻田大學古典籍綜合資料庫），頁 1。

《詞韻》上下二卷，全部十五卷。」³⁶ 根據康熙刊本《詞學全書》的渡來紀錄，曾出現將《詞學全書》誤載為十五卷、作者誤植為賴以邠，並以為「《詞學全書》又名《填詞圖譜》」的違誤看來，《唐本類書考》同樣將《填詞圖譜》的作者賴以邠誤植為《詞學全書》作者，以及卷數總數的記載，似乎不能排除編者所參照者為康熙刊本，而非乾隆刊本的可能。³⁷

另外，神田氏提到《詞學全書》最初的刊行是在乾隆十一年，惟依舶載紀錄所示，《詞學全書》在康熙時期即已刊行，並在江戶時期數次東傳。因此，《唐本類書考》所載之《詞學全書》是否可以直接認定為乾隆刊本即有疑慮。神田喜一郎之所以認定《唐本類書考》所據為乾隆刊本，或許是由於當時並未看到《舶載書目》等書目文獻，且日本國內可見之藏本均為乾隆刊本，而康熙刊本所藏不明的緣故。

事實上，根據日本全國漢籍數據庫（日本全國漢籍データベース）的檢索結果與筆者訪書所見，現今日本國內各大圖書館館藏或私人文庫所收藏之《詞學全書》均為乾隆十一年序的致和堂刊本或世德堂刊本兩種。比較公文書館的世德堂刊本與天理圖書館的致和堂刊本為例，兩者版式皆為四周單邊（17.8×11.8 cm）有界 9 行 20 字小雙行，版心白口上魚尾，序末有「乾隆十一年歲次丙／寅長至日查培繼／題於如圃草堂」字樣。惟公文書館（世德堂本）的查培繼印與王望印皆有割除痕跡（見圖），天理圖書館所藏致和堂本《詞學全書》則保留了原本的版式，兩者差異僅在於年號干支由康熙更動為乾隆，以及「致和堂」三字的間距略有參差，其餘行數與版式字樣均為相同。這些乾隆刊本的《詞學全書》散見於各大圖書館或私人文庫的藏書目錄，而與舶載書目等紀錄數量頗有落差。之所以如此，現存舶載資料的不完備或為原因之一，更重要的是寶曆元年以降，漢籍（或稱「唐本」）輸入數量劇增，地方大名或湯島聖堂以外的學者也能

36 （日）向榮堂主人輯，《唐本類書考》卷上，頁 59。

37 現存舶載書目《詞學全書》卷數與冊數的記載落差主要在於《填詞圖譜》卷數的計算。大抵而言，乾隆刊本的《詞學全書》版式卷數皆延續康熙刊本而來，康熙刊本的《填詞圖譜》為六卷及《續集》一卷，而乾隆時期的致和堂與世德堂刊本於日本圖書目錄解題則載為《續集》三卷。究其緣由，實因原書《填詞圖譜續集》雖題為一卷，但是由卷上、卷中與卷下三部分構成，致使出現十四或十六卷之落差。

經由訂購或委託等管道購入唐本漢籍；³⁸有鑑於漢籍輸入數量日益增長，長崎書物改的人力難以負擔須逐船逐本作成，且渡來數量日益龐大的大意書撰作事務。為簡化原先繁瑣的手續，寶曆六年（1756）六月以後，改以僅記載「新渡唐本」的方式因應。意即，當先前大意書或持渡紀錄中已詳細載明內容大要的漢籍再次渡來之際，書物改不必重複審查，僅需登載先前未見諸記載的漢籍即可。³⁹

日本國立公文書館館藏的（原昌平坂學問所舊藏）的乾隆世德堂刊本《詞學全書》即是江戶時期持渡書卻未見於現存《舶載書目》之例證。書中所收的《填詞名解》卷末左下角有「寬政戊午（1798）」的無框朱印。據福井保〈內閣文庫小史〉考證，此為寬政九年（1797）年昌平覺改為官學之後捺印於新收書物的入庫印；《昌平志》所載之林氏藏書的《詞學全書》，由於是後來才轉入昌平坂學問所書庫，不可能出現干支印。因此，公文書館藏《詞學全書》應為寬政九年昌平覺改為官學以後始入庫者。⁴⁰昌平坂學問所舊藏的《詞學全書》屬於舶來漢籍，這一點無庸置疑。然而，此本之所以未見於渡來紀錄，應與寶曆六年以後僅需詳載新渡唐本書目大意的政策有關。部分江戶文人舊藏的《詞學全書》未見於《舶載書目》亦是相同情形。⁴¹附帶一提的是，日本國內現存的乾隆刊本《詞學全書》可能來源有二：一是明治以後地方大名藩主散出的藏書，二是日本文

38 （日）柏崎順子，〈高橋華陽〉，《言語文化》46(2009.12): 53。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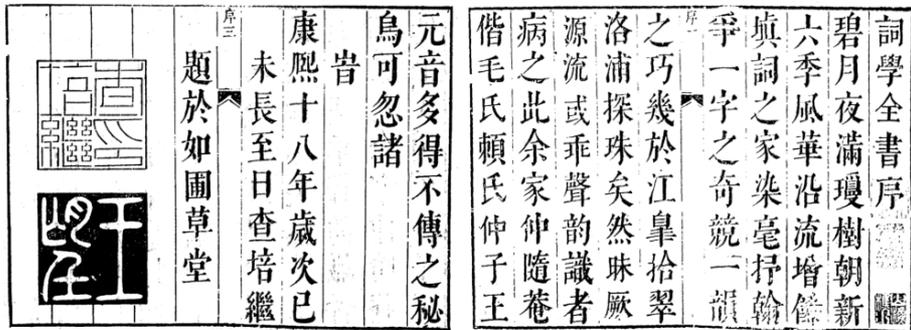
39 （日）大庭脩，《日中交流史話——江戶時代の日中關係を読む》，頁 76-77。

40 福井保〈內閣文庫小史〉云：「昌平坂學問所的年號干支藏書印有三種字體，年代以寬政十年（1798）戊午為始，至慶應三年（1867）丁卯為終，範圍不出於此。意即，在寬政九年（1797）昌平覺改為官學以後，在新收的書目上，以當年年號與干支印為標示的藏書印。至於林家傳來之書，由於在此前已經入藏，因此並無干支印。……（干支印）不限於購入之書籍，同學問所內的新寫本和官版也有押印記號，僅番外書冊原則上無押印。」由此可知，現公文書館所藏之乾隆序刊本《詞學全書》應為寬政十年（1798）以後入庫者，故有干支押印記明。原文見（日）福井保，〈內閣文庫本考證〉（東京：青裳堂書店，2016），頁 364。

41 江戶時代中後期的幕府文人兼狂歌師大田南畝（1749-1823），其南畝文庫亦收有《詞學全書》。（日）大田南畝原編，川瀨一馬編校，《南畝文庫藏書目》（東京：日本書誌學，1953），卷 1，頁 91。

人親自或委託他人赴中國購入的書籍。在缺乏渡來紀錄的情況下，各家藏本是否均屬於江戶時期唐船持渡書，尚難一概而論。⁴²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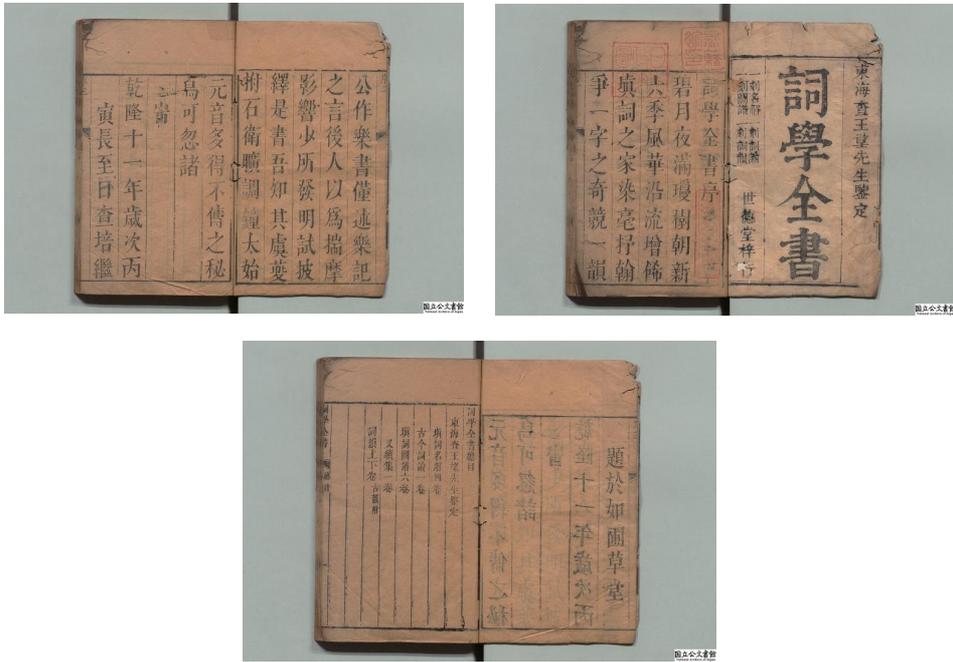
總之，無論是早年傳入的康熙刊本，還是其後未見於舶載紀錄的乾隆刊本，從江戶時期以來《詞學全書》的渡來次數與現存藏書紀錄來看，不難推測此書在當時文人間已擁有相當的閱讀基礎，這也促使唐船主持續輸入此書。神田喜一郎（1897-1984）以為「江戶時代的學者，多以此書來理解填詞，可以說是把此書作為典範來信奉的。」⁴³亦是肯定了《詞學全書》在江戶眾多渡來詞籍中的重要地位。



圖一 續修四庫全書所收之康熙十八年（1679）序《詞學全書》

42 這些傳入年代落於江戶後期至明治初期的《詞學全書》，其來源或是由明治以後幕府地方大名或私人文庫散出，或為日人至中國收購，如清人陸心源（1838-1894）之舊藏即為靜嘉堂文庫所購入。至今日本古本書店仍可見不少散出之《詞學全書》。筆者即曾於東京神保町的山本書店、東京大學東洋文化研究所倉石武四郎（1897-1975）與前野直彬（1920-1998）舊藏、東京大學文學部漢籍コーナー等處閱覽過世德堂與致和堂刊行的乾隆刊本之《詞學全書》；拍賣網亦可見高野辰之（1876-1947）斑山文庫之舊藏，國文學研究資料館藏（日本古典籍データセット）有「《詞學全書》八卷，故南陔先生（即丸岡南陔，1825-1886）遺書。先生之歿也，為紀念，係南畝兄（即大田南畝）所贈」與「贈呈鵜飼竹田君（即鵜飼郁次郎，號竹田，1855-1901）明治庚子春（1900）岩木擴（1854-1933）」兩條記事。此外，成書於明治期間的《文求堂輸入唐本目錄》同樣也有《詞學全書》的輸入與販售紀錄。不難想見《詞學全書》在江戶至明治、大正時期的流通概況。見（日）田中慶太郎編，《文求堂輸入唐本目錄》（東京：文求堂，1906），頁11。

43 （日）神田喜一郎著，程郁綴、高野雪譯，《日本填詞史話》，頁82。



圖二 昌平坂學問所舊藏《詞學全書》世德堂刊本序言 日本國立公文書館



圖三 斑山文庫 高野辰之舊藏⁴⁴

44 高野辰之(1876-1947), 號斑山, 長野縣人, 東京大學文學博士。歷任文部省圖書官、東京音樂學校教授與東京帝國大學文學部講師。帝國學士院受賞。著有《日本演劇史》、《日本民謡の研究》及《江戸文學史》。「點滴拍賣」, <https://www.qudiandi.com/product/item/pid/10000473.html> (2023.11.22 上網檢索)。由於天理圖書館致和堂刊本拍攝申請繁瑣耗時, 故以同樣版式與出版者的斑山文庫本為示例。

四、《詞學全書》的輸入與江戶文人的漢學教養

江戶幕府的鎖國政策與書籍審查制度，限制了當時日本人接受外來知識的管道與範疇。附隨於中國與荷蘭商船貿易進入日本的書籍，成為當時日本外國知識輸入的主要窗口，而唐船持渡書自然也構成了江戶文人認識明清時期中國學術的基礎。然而，這一時期的日本文人並不僅止於單向接受明清傳來的各類知識，更試圖在中國學術的基礎上，開拓日本漢學獨特的論述與研究視角，從而使得江戶儒學思想呈現百花齊放的盛況。在文學方面，由於長崎唐船貿易的繁盛，擔任貿易翻譯的唐通事、明末流寓長崎的僧人與唐人清客匯聚於此，吸引了眾多日本文人學者前來交流，促進了江戶時期唐話學的發展。中國的通俗小說與艷情小說更成為此時日本人學習唐話的重要教材來源。⁴⁵

隨著唐話學的興盛與通俗小說的流行，日本人對小說內容理解的需求日益加深。岡白駒（1692-1767）於寬保三年（1743）與寶曆三年（1753）先後出版的《小說精言》與《小說奇言》，以及寶曆八年（1758）澤田一齋所著的《小說粹言》，選取了明代《三言二拍》等通俗小說的篇章進行日譯，並附上訓點與難解詞彙的註解。⁴⁶ 原本穿插於小說的填詞也隨著小說的日譯得到了被人所認識與閱讀的可能。神田喜一郎所謂「當時與其說是作填詞，不如說更加注重的是如何正確地讀填詞的問題」，正是反映了當時日本文人翻譯小說的目的並非在於文類的辨識與接受，而是為了理解小說的故事內容與詞彙意義。⁴⁷ 因此，這類附隨於明清白話小說的詞作並未引起日本文人的廣泛關注與創作嘗試，僅能視為通俗詞傳入日本

45 關於艷情小說與唐話學之關係，可參見：羅苑翎，〈江戶時期明清艷情小說之傳入及其閱讀性質——以《如意君傳》和刻本、通俗本、考證本為例〉，《漢學研究》35.4(2017.12): 245-247。

46 案：《小說精言》、《小說奇言》與《小說粹言》三書為江戶中期儒學者岡白駒、澤田一齋師徒二人從《三言》、《二拍》與《西湖佳話》等白話小說中擇選部分作品，除就原文施以訓點外，針對文中所使用的語言亦附上日文解釋，方便讀者閱讀。

47 （日）神田喜一郎著，程郁綴、高野雪譯，《日本填詞史話》，頁 85。

的一種途徑。⁴⁸

相較於其他的詞籍傳入型態，以詞譜為載體的文人詞作亦隨著儒學與詩學等漢籍東傳日本，使江戶文人得以通過研讀詞譜及其後所附的詞例，逐步掌握「倚聲填詞」的方法。如前所述，在江戶中期《詞學全書》傳入之前，已有《嘯餘譜》、《詩餘圖譜》及附於《文體明辨》之後的詞譜傳入紀錄。然而，當時江戶文壇仍以唐宋詩的優劣辯論與古文為主流，詞體僅被視為附錄於詩文之後的「詩餘」文字，並未受到廣泛重視。這種傾向直到江戶中期以後才逐漸轉變。誠如前述，《詞學全書》的全集性質涵蓋了詞牌源流、詞論、詞韻與詞譜等詞體基礎知識，對於欲學習填詞卻因詞樂佚失等限制而不得其門而入的江戶文人而言，無疑是最為全面且適切的入門指南。

以下即從江戶中期儒者三浦梅園（1723-1789）與昌平坂學問所關於《詞學全書》的論說著手，釐清江戶學者對此書的接受脈絡。

（一）三浦梅園及其《詩轍》

《詩轍》出版於天明五年（1785），為三浦梅園晚年對詩法與詩體流變的集大成之作，同時也是江戶時期日本文人對詩體最為完整且體系化之說解。知名儒者龍草廬（1714-1792）的〈詩轍序〉即云：「自周詩楚騷漢魏六朝之作，逮唐之近體以來，宋元明清，及我聖和之上世至今日。大凡所關係於詩之緯，盡其蘊，究其奧，細大亡殘，而論之評之，遂大成斯書矣。實可稱謠（筆者案：疑為「詩」）家之金科玉律。」⁴⁹稱許《詩轍》

48 近年藤田優子針對萬曆年間成書的《花草粹編》進行考察，指出書中所收錄的詞作多為馮夢龍《三言》刊行之前殘存於白話小說中的佚文詞篇，由此可窺見詞作與白話小說在明代的流傳關係。此外，現藏於日本文書館的紅葉山文庫舊藏萬曆十一年序刊本《花草粹編》（請求記號：集 111-0006），亦可作為此類白話小說詞篇總集曾流傳至日本的佐證之一。然而，根據日本全國漢籍數據庫的檢索結果，目前僅見公文書館藏本，且無其他相關渡來紀錄，顯示這類通俗詞在江戶時期並未成為詞學接受的主流。（日）藤田優子，〈《花草粹編》における白話小説の利用——明代詞籍の刊行を可能にしたもの〉，《明代における詞の受容：文字の文学と音の文藝》（東京：汲古書院，2020），頁 139-172。

49 （日）梅園會編，《梅園全集》下冊（東京：弘道館，1911），頁 365。

為一貫古通今之作，其中對詩體的相關議題，無不鉅細彌遺，可為後人之法。另一篇出身日出藩（現九州大分）儒者喬維嶽的序言中同樣推崇此書是「以其塵垢秕糠，陶鑄此編。不遑願夫自暴自棄者，乃憫將用其教」，⁵⁰為後人立下得以遵循的詩學正軌。在此一脈絡下，詞體也同時以詩餘的身分進入江戶文人的視野。從而，當三浦梅園執筆詩體流變時，自然詞體也被納入其論述範圍。以下即著眼於三浦梅園所撰作的詩餘相關詞條解釋，觀察其對詞體的認識及《詞學全書》的引用與接受。

1. 文體盛衰論——樂府闕而有詩餘

盛傳於明代詞壇的《花間集》與《草堂詩餘》隨著船舶貿易東傳進入了江戶文人的閱讀視野，成為文人認識詞體的契機。除卻江戶初期林羅山一家的零星紀錄外，亦見諸於江戶中後期諸多典籍書目之記載。由隨緣道人（即釋敬首，1683-1748）口述，刊行於寶曆四年的《典籍概見》，以及山本北山（1752-1812）的《作詩志彙》均有《花》、《草》二書的紀錄。⁵¹明人以詩餘為「古樂府之流別，而後世歌曲之濫觴」的觀點也成為江戶時人對詞體的普遍認知。⁵²三浦梅園承繼了以詞體為詩餘的說法，將詞體置於《詩轍》卷三的「異體·變法」的詩餘範疇之下，而後依循「詞之由來」、「詞之篇目」、「詞之所用」、「名義」、「詩餘三調」、「詞譜」等條目逐一解明。接著引用何良俊〈草堂詩餘序〉的說法，概括原文內容大意，以為詞之由來的說解。重申詞為詩與樂府相繼亡廢後成形的文學體類，詩詞相續是文學發展盛衰的結果，即所謂「樂府闕而有詩餘」。

其次，三浦梅園也延續了明人劃分樂府與詩餘時代分界的說法。他提到：「詞、曲雖然在唐之前已有，然而名為宋詞、元曲的詞曲興於宋元，

50 案：本序為清客程赤城所書。程赤城（1754-1815），名霞生，字相塘。為清中葉時往來於中國與長崎之間的船主，因通曉日語、長於書畫。除曾評龍草廬（1715-1792）之書法為「似婦人之書」外，亦先後與日本儒者春木南湖（1759-1839）與福山藩的儒醫伊澤蘭軒（1777-1829）多有交流。引文見（日）梅園會編，《梅園全集》下冊，頁366。

51 （日）青木正兒，《支那文学芸術考》四版（東京：弘文堂書房，1948），頁59。

52 何良俊，〈草堂詩餘原序〉，收入彭志輯校，《明人詞籍序跋輯校》（杭州：浙江大學出版社，2021），頁95。

至唐以前則無。」⁵³ 其後的「詞之所用」條又引用《古今詞論》中王阮亭（即王士禛，1634-1711）「唐無詞，所歌皆詩也；宋無曲，所歌皆詞也」之說，認為此條可為詩詞時代之別。⁵⁴ 對他而言，唐詩、宋詞與元曲各為一代的代表文體，不可輕易混雜變易。

當朝代與文體流變有所重疊時，三浦梅園也為此提出了一套解釋。例如他將李白的〈憶秦娥〉（簫聲咽）視為歌行體的雜言詩；而〈菩薩蠻〉（平林漠漠煙如織）雖為後世所用，但由於唐代並無詞體，因此對三浦而言，這類作品的出現應歸功於作者駕馭文字的功力，而非新文體的創制。⁵⁵ 在「詞譜」條目中，他引述《填詞圖譜》所載溫庭筠〈荷葉杯〉為例，再次強調唐代無詞。即便溫庭筠的作品包含六言、五言、七言等長短句形式，仍應歸類為詩而非詞。⁵⁶ 這些關於詞體起源與分界的論述，與前述王士禛的詞論觀點頗為相近。考慮到江戶時期明人論著如李攀龍《唐詩選》、徐師曾《文體明辨》與吳訥《文章辨體》等在日本文人間的廣泛流傳，三浦梅園承繼明人詞論觀點，亦屬自然。

2. 以《詞學全書》為條目編寫參考

前面提到三浦梅園引用《填詞圖譜》的詞例作為文體盛衰論的例證，而在具體創作細節上，也不時可見三浦梅園引述《詞學全書》內容作為條目寫作的基礎。⁵⁷ 如「詞之所用」一條即引用《填詞名解》「填詞雖屬小道，然宋世明堂封禪，虞主祔廟之文皆用之。比于周漢雅頌樂府，亦各一

53 (日) 梅園會編，《梅園全集》下冊，頁 479。

54 同上註，頁 480。

55 類似的論說，尚可見於《詩轍》卷之五。其道：「是サキノ菩薩蠻ノ詩ト、後世詞曲トナシテ用レドモ、此時詞ハナシ是等ニテ、文字遣ヒト工夫スベシ。李白〈行路難〉：『昭三（案：應為王之誤），白骨縈爛草，誰更掃，黃金臺。行路歸，難去來。』ト三言ニテ結ビタルモアリ、是等近體ノ事ニ非ズトイベドモ、書シテ蒙土望蜀ノ意ニ供フ。」三浦梅園重申李白〈菩薩蠻〉與〈憶秦娥〉兩首屬於詩的範疇之餘，也提到〈行路難〉三言句連用並非近體詩的型態，但並未有進一步的說明。同上註，頁 568。

56 同上註，頁 481。

57 三浦梅園在《詩轍》之二「體製」一章中亦曾借用《填詞圖譜》以黑白圈為平仄的標示方式，解明詩律之正格與偏格。同上註，頁 412。

代之制也」之說，強調詞體與樂府的密切關係，而各為一代之制。⁵⁸「名義」一條則提到《填詞圖譜》的詞例，強調腔為譜之要處，核心既定，即可依腔調詞，擇腔定調。又引述《古今詞論》所謂「詩餘謂之填詞，則調有定格，字有定數，韻有定聲。至於句之長短，雖可損益，然亦不當率意為之。」⁵⁹並以其說為是。《填詞圖譜》作為當時江戶文人重要的填詞參考，陳水雲曾評述道：「在清初，按譜填詞已是一種共識，《詩餘圖譜》、《嘯餘譜》對這種共識的達成，功不可沒，《填詞圖譜》可以說是把這種認識做了進一步的強化。如果說《詩餘圖譜》、《嘯餘譜》對唐宋詞體式的建立厥功至偉，那麼《填詞圖譜》則把這種『調有定句，句有定字，字有定聲』的體式觀念做了進一步的完善和充實。」⁶⁰《填詞圖譜》是奠基於《詩餘圖譜》與《嘯餘譜》的基礎上加以完善之作，縱然內容訛誤頗多，然而作為初學者的填詞指引，此一適量且囊括了填詞基礎入門知識的全集，對江戶時期的日本文人而言，毋寧更易於親近使用，增加了文人試作的可能。⁶¹

三浦梅園兼具詩人與儒者的雙重身分，青木正兒指出其《詩轍》一書大量引用《詞學全書》的內容編寫「詩餘」條目。⁶²據三浦自筆的讀書日誌——《浦子手記》的記載，他接觸《詞學全書》的時間較晚，為安永辛

58 (日)梅園會編，《梅園全集》下冊，頁480。

59 同上註，頁481。

60 陳水雲，《清代詞學觀念史論》，頁151。

61 日本文人在江戶初期便意識到詞樂佚失所帶來的創作困難，因此在詞學譜律書籍傳入後，他們仿照明清詞律圖譜所載的平仄韻律進行選調填詞。《填詞圖譜》將詞作分為小令、中調與長調三類，並依類別標明詞牌、平仄與押韻，同時附上詞例的編輯體例，無疑是最適合初學者的安排。值得注意的是，《填詞圖譜》所收詞例已不限於宋人作品，部分明清詞作亦參雜其中。例如，《填詞圖譜續編》卷下即收錄了明人楊慎（1488-1559）的〈賽天香〉。換言之，明清文人詞作除了以個人別集形式傳入日本外，也透過詞譜所附的詞例進入日本文人的接受視域。

62 青木正兒亦指出三浦梅園《詩轍》關於詞體的論說係取自《詞學全書》。其道：「江戶期中葉以後、詞即ち、詩餘が漸く學者の注意を引くやうになつて來た事を舉げねばならぬ。……同時に三浦梅園の「詩轍」（天明五年刊）卷三には詩餘に關して其由來名義詩形等の要点をやや詳しく述べて居る、引用の書名から察するに清初に編せられた『詞學全書』に就て見たらしい。」（日）青木正兒，《支那文学芸術考》四版，頁58-59。

丑（1781），即《詩轍》出版前四年。⁶³三浦梅園將詞體納入《詩轍》的「異體·變法」為論，旨在展現其對詩體流變（由詩至詩餘）的整體認識——即龍草廬所謂「大凡所關係於詩之緯，盡其蘊，究其奧，細大亡殘，而論之評之」的纂作動機，而非展示個人對詞體的理解程度。之所以如此，與三浦梅園的關注重心仍在詩學而非詞學，且接觸《詞學全書》時間較晚、對詞體認識有限，因而撰寫條目時僅能參酌裁剪前人說法有關。

此外，時代略晚於三浦梅園的儒者文人亦有不少關於《詞學全書》的閱讀紀錄與評價。如儒學家猪飼敬所（1761-1845），其書柬集中便有一條關於《詞學全書》的記載。文中提到：「《詩學鴻裁》、《古文鴻裁》，清順治中，范梈，周來二人，選定古今詩文所書。《嘯餘譜》余未讀，而詞曲之作法，《詞學全書》已詳，就其譜考其平仄清濁而填字，故又稱填詞。」⁶⁴這裡提到的「譜」，或即《詞學全書》中所收錄的《填詞圖譜》。猪飼不僅認為《詞學全書》已詳細載明詞曲作法，更以《填詞圖譜》為例說明詞譜的用途。田能村竹田（1777-1835）則是鑑於「比來清舶所齎，雖有草堂諸集，圖譜數種，多置不顧。加之卦漏訛謬相襲，笥中徒逞蠹魚之欲」，⁶⁵得萬樹《詞律》二十冊後，「考諸家所著圖譜及詞選，而專從萬氏之格」，在文化元年（1804）編成了《填詞圖譜》，並於文化三年（1806）出版。⁶⁶此處的「諸家所著圖譜及詞選」，青木正兒以為即包括了《嘯餘譜》、《詩餘圖譜》及《詞學全書》所收之《填詞圖譜》等。⁶⁷並且，田能村竹田曾

63 案：據筆者檢索，除《詞學全書》之外，《浦子手記》中並無他詞籍閱讀的紀錄。（日）三浦梅園，《浦子手記》，收入（日）大分縣史料刊行委員會編，《大分縣史料第22》（大分：大分縣立教育研究所，1960），頁106。

64 （日）猪飼敬所，《猪飼敬所先生書柬集》，收入（日）池田四郎次郎、濱野知三郎、三村清三郎編，《日本芸林叢書》第4卷（東京：六合館：1928），頁19。

65 （日）田能村竹田，《填詞圖譜·發凡》，收入（日）大分教育廳管理文化課編，《田能村竹田資料集·詩文篇》（大分：大分縣教育委員會，1992），頁6。

66 青木正兒云：「田能村竹田に至つて、『填詞圖譜』二卷（文化三年1806刊）を著して略ぼ詞の如何なるものかを説明し、若干の詞形と作例と列して居る。自ら調ふ享和二年（1802）に萬樹の「詞律」廿冊を得て之を底本とし他に數種の書を参考にしたと、而して『草堂詩餘』、『嘯餘譜』、『詞學全書』なども見て居る。」（日）青木正兒，《支那文学芸術考》四版，頁59。

67 村越貴代美《田能村竹田の詞論：〈填詞圖譜〉を中心に》一文提到田能村竹田〈填

提到長崎漢學家松浦東溪（1752-1820）藏有《詞學全書》，並表達了自身企盼獲得此書抄本的願望。⁶⁸他在京都遊學期間，致伊藤鏡河（1752-1829）的書信中亦提到：「京都也已經進入詩餘即將流行的時期，希冀（田能村自身）詞集能夠早日刊行，書肆方面也頻頻催促。」⁶⁹足見詞體在當時逐漸被文人所熟知且嘗試習作的發展趨向。

儘管《詞學全書》早在十七世紀末便有東傳紀錄，然而從三浦梅園晚年的讀書日誌，到豬飼敬所、田能村竹田、松浦東溪以及伊藤鏡河這些記載來看，《詞學全書》廣泛地在文人群體間流傳、閱讀與收藏的期間，約略落在十八世紀末至十九世紀初的江戶中後期。相較於江戶初期《花》、《草》等詞籍的流傳範圍有限，江戶中後期從江戶（東京）、京都到長崎等地均有文人閱讀紀錄，亦不難想見《詞學全書》的流傳範圍已相當廣泛。此時期的日本文人填詞試作日漸頻仍，所見作品數量顯著增多，亦顯示時人對詞體興趣與接受程度的提升。

詞圖譜·發凡）所謂：「按圖譜音，」即是引述毛先舒收錄於《詞學全書》之「按圖譜音，」（日）村越貴代美，〈田能村竹田の詞論：《填詞圖譜》を中心に〉，《慶應義塾大学日吉紀要・中国研究》12(2019.3): 97。

68 木崎好尚的《竹田日譜》提到田能村竹田於文化二年（1805）八月至京都遊學期間有「詞（填詞）の類も、追々詮義出來申候而、是非共仕上ケ申度存念ニ御座候。此レニ付申候而モ、長崎松浦氏（東溪）ノ藏、詞学全書ハ寫し申度事ニ而、日々頸ヲ西方ニ引キ申候」（填詞之類同樣也是逐漸吟詠玩味而能有所得，期許能共同努力完成詞體內蘊的探詢。就此，長崎東溪之藏書——《詞學全書》抄寫一事，日日向西方引頸企盼。）之記載，將填詞視作培養學者與藝術之士的立身根據。（日）木崎好尚，《大風流田能村竹田一》（東京：民友社，1930），頁92-93。並且，田能村竹田於文化元年（1804）《填詞圖譜》成書後，又於隔年（1805）九月的〈填詞國字總論〉提到「《詞學全書》較備レルニ似タリ」（《詞學全書》似較完備），以為《詞學全書》即便非全無缺點，但已較其他圖譜完備。田能村竹田是否獲得了長崎東溪的「《詞學全書》」的藏書抄寫許可不得而知，但相較於其他詞學書籍，他顯然給予了《詞學全書》較高的評價。其書名《填詞圖譜》，或許也是沿用《詞學全書》而來者。見（日）大分教育廳管理文化課編，《田能村竹田資料集・詩文篇》，頁68。

69 原文為：「京師も最早詩餘の流行申候時節近き様子に御座候、早く出し申し度存念に御座候、書肆も頻々に促し申候。」見（日）木崎好尚，《大風流田能村竹田六》（東京：民友社，1930），頁44-45。

(二) 昌平坂學問所——林氏藏書與佐藤一齋 (1772-1859)

昌平坂學問所作為德川幕府最高的儒學教育場所，是以林羅山家族為儒學傳承主脈，遍及其後門人弟子。學問所的藏書來源是以德川家的藏書為基底，後與林羅山之藏書合流，又經過歷代大學頭如林鳳岡（1645-1732）、林述齋（1768-1841）等人不懈地充實藏書——經由唐船貿易購入漢籍、新寫的書籍與官方賜書等方式逐步積累而成。林家一門為江戶幕府認可的漢文知識教授與傳遞者，其漢籍藏書既是林家廣泛閱讀與收藏品味的展現，亦是當時昌平坂學問所漢學知識傳授的基礎。刊行於文政元年（1818）的《昌平志》，即是昌平坂學問所之漢籍藏書目錄，亦可視為學問所內漢學知識構成的縮影。

《昌平志》為寬政初期昌平坂學問所的儒官犬塚遜（1750-1814，字退翁）所編。書前收有尾藤肇於寬政甲寅（1794）的〈昌平志序〉，記述昌平坂學問所的設置始末。從德川幕府延聘儒者林羅山主掌學問所，並於忍岡（忍ヶ岡，即今上野一帶）建立聖廟，教授朱子學。至天明年間（1781-1789）遭逢大火焚毀後，重新設立的經緯。其後又有犬塚遜於寬政庚申（1800）的序言，說明此書之編輯目的是為保存「國朝盛典」，使「後世以知其治所由」，以「誇示萬國」。⁷⁰ 書中詳實記錄了當時昌平坂學問所的漢籍藏書與林氏藏書的概況，並以按語述明林氏藏書歷經多次火劫，在後人極力蒐羅購入之下，逐步充實的過程。其道：「按林氏藏書涉於明曆前者（1655），皆羅山子購收而燬於丁酉（1657），或以分與諸子門生，所餘甚眇矣。而今貯畜，皆係我鵝峰（案：即林春齋）、鳳岡（即林春常，1645-1732）二先生之購致。亦罹於明和災，多所散失。至今林君述齋（1768-1841）先生，益廣購募，補其未足。今附之以每類後，別以寬政己未（1799）收。但未定為之序次，姑從購收之先後，後之君子其正之。」⁷¹ 林氏藏書在明曆以前遭逢火焚，燬佚甚多。是以《昌平志》〈經籍志〉所載《昌平志》林氏藏書構成，除少數為林羅山舊藏外，多為林春齋、林鳳岡與林述齋等人購置增補。其中與詞學相關者，計有《嘯餘譜》、

70 （日）犬塚遜，《昌平志》（東京：日本國會圖書館藏文政元年〔1818〕寫本）。

71 同上註。

《草堂詩餘》、毛晉《詞苑英華》、《詩詞雜俎》、查繼行《詞學全書》、⁷² 萬樹《詞律》以及朱彝尊《詞綜》等書。⁷³ 是在毛利家獻上書之外，詞學書籍收藏較為完備者。

關於林家一門與詞體的淵源，神田喜一郎曾概括林羅山（1583-1657）與其子林春齋及讀耕齋（1624-1661）等人的填詞始末與可能經眼的詞集文獻。⁷⁴ 如林羅山於慶長九年（1604）即曾閱讀《文章辨體》，⁷⁵ 日本國立公文書館館藏的萬曆三十六年（1608）《新刻註釋草堂詩餘評林》刊本，其上除林羅山朱筆圈點外，書後亦有「道春（案：即林羅山之字）乙覽了」的字樣，⁷⁶ 另外尚有通過了的（生卒年不詳）借閱水戶藩藏書的紀錄。林羅山的四子林讀耕齋曾從加藤明友處借閱《花間集》，在萬治三年（1660）寫成〈書花間集後〉一文。其道：「蚤讀宋人之有云：『歐陽子小詞似《花間集》。』……余往歲曾閱藤子默家藏之此書（案：即《花間集》），爾後欲待新渡到者以求之而未之得也。」又有觀花之際，「以欲成吟，以欲擊節，喉腔音調之不可得識，無奈之何而已」之嘆。⁷⁷ 此外，林春齋之子林梅洞（1643-1666）亦曾提問朱舜水（1600-1682）詞體合樂性之問題，其道：「《花間集》及《草堂詩餘》，凡近世樂府，悉皆協於絲

72 由於《昌平志》並未標明《詞學全書》的刊本年代，難以確知與公文書館館藏是否為同一。惟從前文提到公文書館《詞學全書》為寬政十年（1798）以後入庫，以及最早的《詞學全書》渡來紀錄為元祿七年（1694）兩點來看，林羅山與其子林春齋顯然不可能看到成書於清初的《詞學全書》，加之以明和時期林春齋與林鳳岡兩人所購置之書籍佚失頗多，現今公文書館之館藏較可能是林述齋任大學頭時期添購入庫者。

73 （日）犬塚遜，《昌平志》。

74 關於林家一門的填詞論述，可參照（日）神田喜一郎著，程郁綴、高野雪譯，《日本填詞史話》，頁 57-69。

75 《文章辨體外集》外集卷五的「近代詞曲」，即收錄了〈菩薩蠻〉、〈漁家傲〉、〈水調歌頭〉等詞牌，竹枝詞亦在其中。見明·吳訥編，《文章辨體外集》（東京：國立公文書館藏嘉靖刊本），卷 5，頁 1-11。

76 明·李廷機編，《新刻註釋草堂詩餘評林》（東京：國立公文書館藏明萬曆三十六年〔1608〕起秀堂刊本），卷 6，頁 16 下。

77 （日）林靖（讀耕齋）著，林憲（晉軒）編，《讀耕林先生文集》（米澤善本，寬文九年〔1669〕刊本），卷 14，頁 6 下 - 頁 10 上。

竹乎？」⁷⁸然而卻僅得到朱舜水含混曖昧的回答。此一紀錄反映了江戶初期之文人即便對填詞饒有興致，但在詞樂佚失不可復得，通曉詞體的專家難尋，又缺乏適當的填詞指南書籍之下，難以習得的無奈困境。⁷⁹總之，即便林家一門對詞體頗感興趣，但由於林家初期教育為私塾之型態，影響範圍僅限於家族成員、特定往來友人與少數門人；加之以當時學習填詞的諸多限制，並未在當時的文人階層引起廣泛的模仿與習作之風潮。⁸⁰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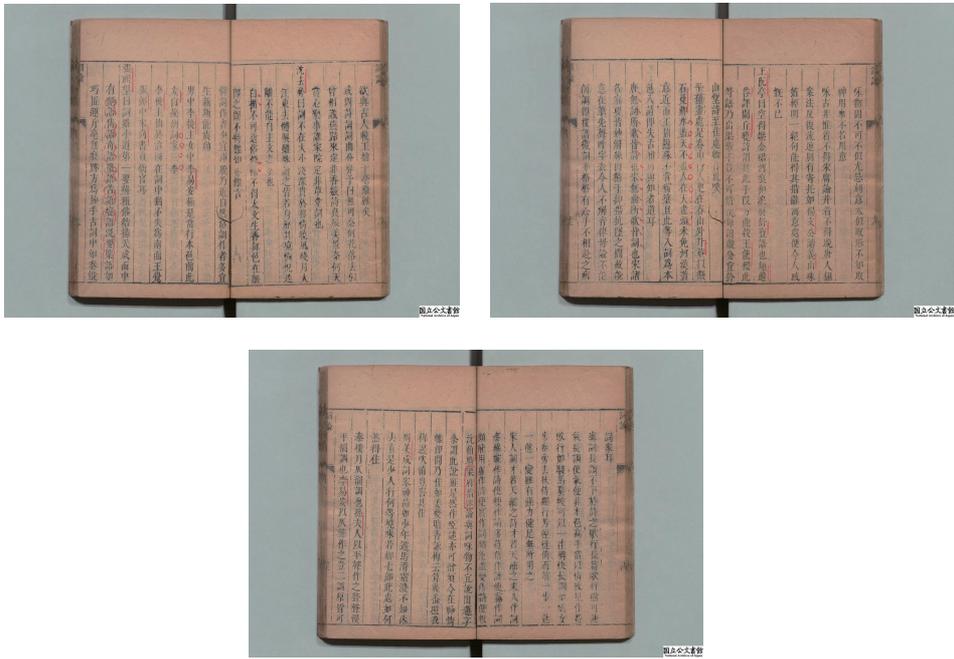
這樣的情況隨著江戶中期《詞學全書》的傳入，以及部分儒者留意到此書並開始閱讀與評述開始有了變化。以昌平坂學問所的林家舊藏《詞學全書》為例，其中的朱墨圈點評述大抵有以下幾類。⁸¹就朱筆圈點而言，第一類是在人名旁施加紅線。如《古今詞論》中的王阮亭、李易安、孫夫人及李後主等。第二類朱筆匡圈主要見於書名出處，如沈伯時的《樂府指迷》。第三類為側圈。主要出現在詩詞引文佳句或專有名詞。前者之例如石曼卿「水盡天不盡，人在天盡頭」；後者為「詞家三李」。第四類為側點，多出現於詞評旁側。如《詞論》「唐無詩，所歌皆詩也；宋無曲，所歌皆詞也。」最後一類朱色弧線則標示重要的概念分類。如「艷語」、「雋語」、「奇語」與「豪語」等。惟全書中僅出現於一處。

78 (日) 德川光圀編，《朱舜水先生文集》，收入(日) 稻葉岩吉編，《朱舜水全集》(東京：文會堂，1912)，卷 22，頁 420。

79 釋敬首《典籍概見》載：「樂府ノ體ハ詩ニ非ズ文ニ非ズ別ニ一體ナル者也。後世此レヲ詩餘ト云ナリ詩餘ノ妙集メタル者ハ花間集。草堂詩餘ノ二書ニ盡タリ花間ハ唐人ノ詩餘ナリ草堂ハ宋人ノ詩餘也詩餘ハ中華ノ文人トイヘトモアヘテ容易ニ作ラズ日本人ナドハ一向ニ思ヒタヘタル事ナリ」(樂府之體，非詩非文，別是一體者。後世將此稱為詩餘。集詩餘之妙者，為《花間集》、《草堂詩餘》二書盡矣。《花間》為唐人之詩餘，《草堂》為宋人之詩餘。雖說是中華文人，尚不易作，日本人等則更加困難。) 到寬延元年(1748)以前，日本文人即便對詞體已有認識，但填制詞作仍相對困難。(日) 隨緣道人口說、天心筆記，《典籍概見》(東京：早稻田大學古典籍綜合資料庫藏，寶曆四年〔1754〕)，頁 18 下、19 上。

80 關於昌平饗教育之變遷，可參照：(日) 山根安太郎，《國語教育史研究：近代國語科教育の形成》(廣島：溝本積善館，1966)，頁 12-13。

81 關於林家舊藏書目與相關研究，可參照(日) 高山節也編，《國立公文書館內閣文庫『林家書目』漢籍對照表並書誌》(東京：二松學舍大學日本漢學研究推進室，2012)，頁 1-127。Danilo Capasso，〈昌平坂學問所藏書目錄の編纂事業に関する一考察：『官庫書籍目錄』及び『昌平饗公借書目』を中心に〉，《藝文研究》126(2024.6)：66-79。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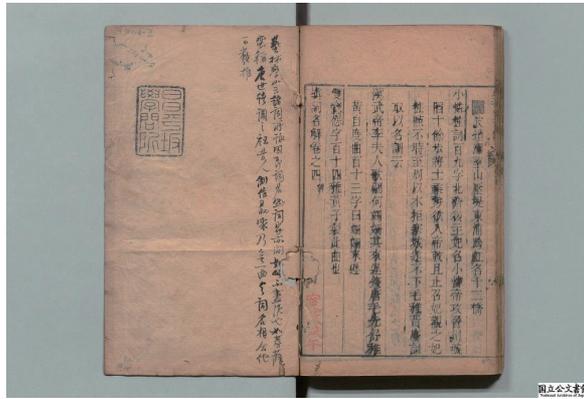
圖四 日本國立公文書館藏《詞學全書·古今詞論》

墨筆部分則集中在《填詞名解》一書，主要是抄錄胡應麟《少室山房筆叢》書中與詞牌相關的說解。請見表三如下：

表三 《填詞名解》批注與《少室山房筆叢》對照表

卷數·頁碼	詞牌	內容	備註
卷一，頁 11 上	〈生查子〉	升菴《詞品》云生槎子，張騫乘槎事也。胡氏《筆叢》已駁之。	原文為：「生查子，查，古字槎，張騫乘槎事也。」胡應麟《筆叢續乙部·藝林學山三》，頁 2 下。
卷一，頁 13 上	〈菩薩蠻〉	女蠻國者，蓋以妝飾類婦人，故名女蠻。使果皆女子，何能萬里入貢唐朝乎？菩薩蠻非專指婦髻也，且浮屠未有婦人為菩薩者。《筆叢》	胡應麟《筆叢續乙部·藝林學山三》，頁 3 下。

卷數·頁碼	詞牌	內容	備註
卷三，頁 1 上	〈滿江紅〉	古今樂府多有名同曲異者，如唐人〈清平調〉與宋人〈清平樂〉迥不同。至宋人〈黃鶯兒〉、〈桂枝香〉、〈二郎神〉、〈高陽臺〉、〈好事近〉、〈醉花陰〉、〈八聲甘州〉之類，與元人毫無相似，若〈菩薩蠻〉、〈西江月〉、〈一翦梅〉元人雖用，悉不可按腔矣。況《冥音》所載一字偶同者乎？	胡應麟《筆叢續乙部·藝林學山三》，頁 4。《冥音錄》旁又有墨筆「升菴詞品《冥音錄》見於《太平廣記》」。
卷三，頁 3	〈六么令〉	《碧雞漫志》云：「六么，一名綠腰。元微之〈琵琶歌〉云：『逡巡彈得六么徹，霜刀破竹無殘節。』」 唐人以腰為么，惟樂天與王建耳。或云此曲無過六者，故曰六么。 沈亞之〈歌者乘記〉云：「合韻奏腰。」又〈記盧金蘭墓〉云：「為〈綠腰〉、〈玉樹〉之舞。」	胡應麟《筆叢續乙部·藝林學山四》，頁 13 下-14 上。 案：原文為「唐人以腰作么」，「誌盧金蘭墓」。《詞學全書》所引述的段落為摘錄原文重組而成，與原文順序略有不同。
卷三，頁 14 下	〈尉遲盃〉	尉遲敬德大盃考本傳及唐雜說，俱未見所出，豈誤懷元雜劇功臣燕（案：應為「宴」）耶？	胡應麟《筆叢續乙部·藝林學山三》，頁 4 上補注。
卷三，頁 18 下	〈蘭陵王〉	蘭陵王破周軍事見本傳通鑑甚詳。	原文為：「蘭陵入陣曲見本傳通鑑甚明。」胡應麟《筆叢續乙部·藝林學山三》，頁 3 下。「長恭」旁有墨筆「高氏」。
卷四，頁 1 上	〈清平樂〉	太白〈清平樂〉，蓋五代人偽作，因李有〈清平調〉，故贗作此詞傳之。	胡應麟《筆叢續乙部·藝林學山三》，頁 4 上補注。
卷末		《藝林學山》云：「諸詞所詠，固即詞名，然詞家亦間如此，不盡泥也。如〈菩薩蠻〉稱唐世諸調之祖，昔人制作最眾，乃無一曲與詞名相合，他可類推。」	胡應麟《筆叢續乙部·藝林學山三》，頁 11 下。



圖五 昌平坂學問所舊藏《詞學全書》日本國立公文書館

由於書中並無未署名，難以確知是否為當時的林大學頭林述齋所為。即便如此，能在書上施以圈點筆墨並旁徵博引與詞牌相關典故者，也必然與昌平坂學問所關係密切。⁸² 並且，從引文中屢次出現的胡應麟《少室山房筆叢》與楊慎《升菴詞品》，不僅展現了昌平坂學問所的學人對明人文集的熟稔程度，也反映出這些人對漢文學的興趣範疇不僅限於詩文，更涵蓋了詞體。同時，這些學者認識詞體的來源並不僅限於《詞學全書》或過往的《花間集》及《草堂詩餘》，而是廣泛涉獵了其他文獻中與詞體相關的記載。

從林述齋的門人，於江戶後期任職於昌平坂學問所的儒者佐藤一齋（1772-1859）對詞體的認識與主張，⁸³ 即可窺知江戶後期昌平坂學問所對詞體的態度。⁸⁴ 佐藤一齋曾從學於大阪懷德堂知名的朱子學者中井

82 案：日本國立公文書館藏《筆叢》共有兩套，一為紅葉山文庫舊藏（請求番號：子 079-0002），另一為林氏藏書（請求番號：369-0065），後者所收之《藝林學山》天頭處亦有少數墨筆批注。其中有一條與詞牌相關的墨筆評注，其道：「〈黃鶯兒〉即唐詩『打起黃鶯兒，莫教枝上啼』始此歟。呵呵。」可以看到《藝林學山》一書在昌平坂學問所內的閱讀情形。惟與《詞學全書》批注的筆跡不同，應非同一人所為。本文所徵引者為林氏藏書本。見明·胡應麟著，江湛然編，《少室山房筆叢續乙部·藝林學山三》（東京：國立公文書館藏明刊本）。

83 佐藤一齋，名坦，字大道，通稱捨藏，號愛日樓、老吾軒等。曾從學於大阪懷德堂的中井竹山，並受教於皆川淇園（1735-1807）。

84 靳春雨曾從佐藤一齋與林述齋的往來交流與林家一門的填詞傳統推論佐藤一齋之所以填詞，受到林家直接影響的可能性頗高。詳可見靳春雨，〈新見日本經學家佐藤一齋詞六首考述〉，收入金程宇編著，《域外漢籍研究集刊》第 24 輯（北京：中華書局，

竹山（1730-1804），寬政五年（1793）成為林述齋之門人。寬政十二年（1800），赴平戶、長崎等地的維新館講授經書。文化二年（1805）三十四歲被拔擢為林家塾的塾長，又於天保十二年（1841）被拔擢成為昌平黌之教席。在此一期間，一齋於天保三年（1832）應津輕侯之邀，編成《初學課業次第》。事實上，《初學課業次第》一名並非始自佐藤一齋。文政四年（1821）時，佐藤一齋即因松山藩更張學政，請課業規則於林述齋。後遂由林述齋口述，佐藤一齋記錄，依據經史子集四部分類簡要列出研習儒學之基礎漢籍，以為《初學課業次第》。林述齋原書於明治四十年（1907）在上野東照宮為人所發現，進而重新抄錄流傳。抄錄者另以小記交代本書發現始末，以「題曰：《初學課業次第》，可謂學者指南車，而實昔日在昌平校教者學者所取準焉。」⁸⁵由此可知，佐藤一齋的《初學課業次第》是在仿照林述齋原書的形式與撰寫初衷之餘，還參酌了當時風行的漢學書目加以增益的結果。⁸⁶

佐藤一齋編寫《初學課業次第》的緣起，如其〈後記〉所云：「以上所錄，不過略舉手邊書名，如欲窮四庫之博，不足十分之一。爰聊著其略，其餘則從諸人精力之所及。然不徒貴博，又不可安於狹小寒陋，故其趨向之方示此耳。本邦之書，雖此中不載，不可不知古今之事迹。國初以後之撰著，讀者亦多。至朝鮮之書，亦有讀者。」後又有漢文補充道：「往年為弘前侯索錄《初學課業次第》，後又為諸生續記必讀書目。然至於真學問則不必在於此也。姑舉當今儒流所為耳。」⁸⁷佐藤一齋於《初學課業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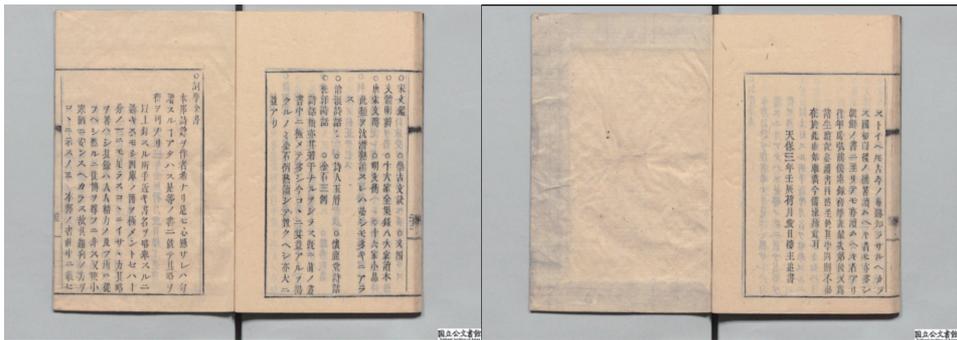
2022），頁 130-140。（得到電子書頁碼）。

85 （日）林衡（即林述齋）口授，（日）佐藤坦（即佐藤一齋）記，《初學課業次第》，《江戶》6.4(1917.8): 57-82。

86 佐藤一齋在林述齋的《初學課業次第》補記提到：「公（即林述齋）之意，蓋不過揭初學標的所載目次，率從簡省耳。若謂讀書亦僅僅止此，則非公之所以望多士也。」《初學課業次第》，《江戶》：82。

87 「佐藤一齋が初学課業次第に述べている内容である。この書は、儒学を修めようとする者のために、その必読文献と学習方法を、あわせ述べたものである。……彼はこの書の中で『姑挙当今儒流所為耳』と述べているから、まず当時の一般的傾向であったと考えてよかろう。……これは昌平黌においてこうした方法が行われるようになった時よりは後のものである。だから、ここに示された方法が、昌平黌のものに規準を置いて当時普ねく行われていたものであったと、判断することができよう。」（日）古田東朔，〈江戸期漢学学習方法覚書——「初学課業次第」をめぐる〉，《國語科教育》3(1956): 40。

次第》列出「句讀」、「講釋」、「會讀」、「獨看」等講授方式與列舉經史子集四庫書籍，《詞學全書》即在集部所收的六十七種文獻之中。對他而言，列舉出這些漢籍書目並非是要限縮儒者的閱讀範圍，而是為了讓有志於學者在此一基礎之上逐步擴充，以拓展治學眼界，同時教授當時昌平黌的學習方法。他將《詞學全書》列於卷末，並以日文附記：「本邦詩餘作者稀少。關於詞，若不注意則難以領會。讀此書，可得知詞之大略。」⁸⁸ 結合前述「姑舉當今儒流所為」，大抵可以推想《詞學全書》被佐藤一齋納入《初學課業次第》，成為漢學教養的應讀書目之一，某程度也反映了此書在當時文壇的流傳狀況與接受程度。⁸⁹ 從佐藤一齋存世的六闕詞作，以及其門人長戶得齋於嘉永五年（1852）《得齋詩文鈔》中收錄的三闕〈漁歌子〉，乃至與昌平黌相關或交好的文人學者，如松崎慊堂（1771-1844）、野村篁園（1775-1843）與鈴木桃野（1800-1852）等江戶後期儒者均有詞作留存，均可見儒者對填詞並無排斥之意。⁹⁰



圖六 佐藤一齋《初学課業次第》日本國立公文書館藏

88 原文：「本邦詩餘ヲ作者希ナリ是モ心懸サレハ句讀スルコトアタハス是等ノ書ニ就テ其略ヲ得フ可ナリ」（日）佐藤一齋，《初学課業次第》（東京：國立公文書館藏，天保三年〔1832〕出版），頁 23 上。（請求番號：190-0448）

89 佐藤一齋於《初学課業次第》所列出的「句讀」、「講釋」、「會讀」、「獨看」等講授方式與列舉經史子集四庫書籍，成為了明治元年以學習院代替大學寮，舊幕府學校再興時，對大學專門教育的構想基礎。可惜後來隨著新式大學設立，此一構想也隨之消亡。可參照（日）山根安太郎，《国語教育史研究：近代国語科教育の形成》，頁 17。

90 （日）神田喜一郎著，程郁綴、高野雪譯，《日本填詞史話》，頁 203-209。

最後，關於《詞學全書》在江戶後期的流傳與《彙刻書目外集》成書與刊刻。文政三年（1820），⁹¹在淺草經營慶元堂書肆的松澤老泉（1769-1822）模仿清人顧修的《彙刻書目》⁹²編寫成六冊《彙刻書目外集》。⁹³當時的儒學者龜田鵬齋（1752-1862）有序云：

藝文書目之學，列代有之。皆所以別標類、撮篇目而備考鑑也。近海舶齋顧氏書目來，書賈松澤老泉獲之大喜，乃資加校讐，藉成參稽，遂輯增補之。又正其訛謬。搜訪之遍，尋討之廣，較顧氏之編錄更加繁富，竟釐而為六卷。各類分門一倣顧氏之例，因名《彙刻書目外集》，細心緝定之功可謂勤矣。夫目耕而播精心耘以除蕪，乃學者事也。也而今商賈鬻利之徒，猶能盡其力於藝文及著學者耕耨之勞。吾輩頗有賴焉，因喜而敘之。⁹⁴

松澤老泉的《彙刻書目外集》是在明人顧修《彙刻書目》的基礎上，因不知顧氏續編是否可得，因此決意自行增益輯錄其他藝文雜書的書目以補顧氏原書之缺。⁹⁵松澤老泉編輯書目出版，固然有「盡其力於藝文及著學者耕耨之勞」的個人興趣，但作為書商，自然也帶有推廣漢籍的商業考量，以滿足文人「有賴」的需求。《詞學全書》作為《彙刻書目外集》中唯一收錄的詞學典籍，而該書目主要以經史詩文類漢籍為大宗，這或許也側面反映了《詞學全書》在江戶晚期已具備一定的閱讀基礎與流通性。⁹⁶

91 按：《彙刻書目外集》與序文有年分落差，或許是因刻本扉頁於文政三年（1820）年已經完成，而龜田鵬齋的序至文政四年（1821）才寫成。推測是扉頁並未重刻，致使產生年代落差。

92 曾任長崎書物改職務的向井元伸於文化二年（1805）曾留有《彙刻書目》的相關記錄。可知清人顧修的《彙刻書目》至少在文化年間已傳入日本，松澤老泉見此書而有《彙刻書目外集》的編輯亦為合理。見（日）大庭脩，《江戶時代における唐船持渡書の研究》，頁 204。

93 松澤老泉，名麥，字士屑。通稱為和泉屋庄次郎，別號一貫二麥居士。為江戶後期淺草一地的出版商，經營慶元堂從事書籍販賣，其自身亦喜好研究典籍，編著有《彙刻書目外集》與《經籍答問》。

94 （日）龜田鵬齋，《彙刻書目外集序》，收入（日）松澤老泉，《彙刻書目外集》（江戶：慶元堂，1820，早稻田大學古典籍綜合資料庫藏），文政四年（1821）序 1-4。

95 （日）松澤老泉，《彙刻書目外集自序》，《彙刻書目外集》，頁 1-2。

96 附帶一提的是，明治四十二年（1909），山田英太郎（1863-1946）與富田鐵之助

要之，《詞學全書》自江戶中期傳入日本後，經過江戶學者文人不間斷的閱讀、創作與提倡，原本被視為「詩餘」的詞體逐漸為日本文人所認識，至江戶晚期更被納入有志於儒學者基礎漢學素養的一環，並影響了明治、大正以後的日本詞壇。明治大正時期的漢詩人森川竹溪（1869-1917）雖批評賴以邠《填詞圖譜》「亦極杜撰」，卻也無法否定在萬樹《詞律》傳入日本之前，《詩餘圖譜》、《嘯餘譜》以及《詞學全書》對日本填詞的深遠影響。⁹⁷ 久保天隨（1875-1934）在《支那文学史》中論及詞體作法時，亦將《詞律》與《詞學全書》兩書列為代表，並對田能村竹田的《填詞圖譜》略有微詞。⁹⁸ 惟儘管明治以降文人對《詞學全書》的評價已不似江戶時期奉為圭臬，但從諸家文學史與個人論著的評述來看，仍間接證明了此書在日本詞學發展中的重要地位。⁹⁹

五、結 論

近現代中國文學研究重視「場域」（“field”）所涵納的多元聲音，藉此觀察中國學者文人如何應對西方與日本輸入的知識，並思索傳統文學在新的知識體系與傳統脈絡下的定位，以及中西文化之間的流動與碰撞。¹⁰⁰

（1835-1916）有感於昌平齋廢後，官版書集或散佚或流向海外，遂商議仿照舊時昌平齋的裝訂方式重刊，命名為《昌平叢書》。其後岩崎久彌（1865-1955）將這批書版捐贈京都帝國大學。大正六年（1917）京大委託京都當地書肆山田聖華房刊印。將原先官版未收的《彙刻書目外集》六冊併入《昌平叢書》，補足了原先明治版《昌平叢書》集部藝文書目的收錄不足。惟無論是明治和大正時期的《昌平叢書》，其中所收漢籍書目都可以視為江戶時期傳來漢籍之種類與範疇的映現。

97 轉引自（日）萩原正樹，《「詞譜」及び森川竹溪に関する研究》，頁 6。

98 （日）久保天隨，《支那文学史》（東京：人文社，1903），頁 309。

99 神田喜一郎《日本填詞史話》：「從明治十年（1877）前後開始，到三洲逝世的明治二十五年（1892），這大約二十年間，雖然極其短暫，但卻是日本填詞史上的黃金時代。」（日）神田喜一郎著，程郁綴、高野雪譯，《日本填詞史話》，頁 243。

100 本段改寫自王德威〈現代中國文論芻議：以「詩」、「興」、「詩史」為題〉：「當我們將中國現代文學視為一個眾聲喧嘩的場域，我們不僅觀察中國學者文人如何應對西方與日本輸入的知識，也必須處理傳統文學文化的前世今生。後殖民主義或帝國主義研究者擅以偵探般的敏銳力考察中西「流動」（或「碰撞」）百轉千折的可能。」王德威，〈現代中國文論芻議：以「詩」、「興」、「詩史」為題〉，《中國文化研究所學報》65(2017.7): 288。

若將此概念挪借至江戶時期的漢籍輸入對日本漢學體系的影響，同樣可見日本文人在接受中國傳來的各類知識之際，嘗試另闢蹊徑，跳脫中國文人思維的框架，提出新的閱讀觀點與詮釋方式。江戶以前，日本填詞風氣並不盛行，即便有零星的詞作留存與詞籍閱讀紀錄，也未見大規模的閱讀與創作活動。直至江戶時期，隨著航海技術的進步與船舶貿易的發達，大量明清時期的唐本漢籍從中國輸入，詞籍亦涵蓋其中。《詞學全書》成書於清初，原本即是為了填詞初學者編纂的簡明詞學總集，囊括了詞調源流、詞韻、詞譜與詞論等基礎詞學知識。隨著唐船貿易傳入日本後，兼具詞學知識總集與填詞工具指南性質的《詞學全書》，其系統性的編排與內容，不僅填補了詞學知識的空白，更為文人提供了從理論到實踐的完整學習填詞的途徑，推動了江戶時期詞學接受與發展的進程。

《詞學全書》是江戶中期以後在日本流傳最廣、影響最深的詞學典籍。江戶中期，隨著文人對唐本漢籍需求的增加與輸入數量的提升，幕府於寶曆六年頒布新令，規定此後僅新渡唐本需登載於大意書。現存唐船持渡書（包括《舶載書目》）所記錄的《詞學全書》，均為新令頒布前輸入日本的康熙刊本，反映了江戶中期以前《詞學全書》的傳入情況，與現今日本國內所藏清一色為乾隆刊本的狀況形成對比。《詞學全書》兼具詞體知識總集與工具書的雙重性質，為日本文人提供了學習填詞的基礎知識與查閱的便捷性。隨著文人對詞體認識的渴求與逐步深化，《詞學全書》也日益受到重視。江戶中期以降的儒者與文人，如三浦梅園、豬飼敬所、田能村竹田與松浦東溪等人，或以《詞學全書》為自身著作的編寫參考，或收藏閱讀，甚至嘗試填詞，顯示此時期部分日本文人已能初步掌握詞體源流與韻譜格律。這與江戶初期文人閱讀範疇多限於《花間集》、《草堂詩餘》，且對詞樂譜律較為生疏的情形形成鮮明對比，反映了江戶時期詞學接受與發展的顯著轉變。

另一方面，從昌平坂學問所內部對《詞學全書》的批點、《昌平志》〈林氏藏書〉收錄《詞學全書》及其他相關詞學典籍，乃至江戶晚期佐藤一齋將《詞學全書》列為漢文學習者的必讀書目，均可見此書影響之深

遠。尤其值得注意的是，《詞學全書》的批點中多處援引胡應麟《少室山房筆叢》進行對照，這不僅顯示當時學問所內的文人對詞體的認識已超越《詞學全書》的範疇，更反映出他們能夠觸類旁通，將詞學知識與其他相關文獻相互印證，從而深化對詞體的理解與詮釋。

《詞學全書》自江戶中期傳入日本後，經過江戶儒者與文人不間斷的閱讀、創作與提倡，作為「詩餘」的詞體更廣泛地為日本文人所認識與接受，並逐漸成為儒者基礎教養與漢學知識體系的一部分，為江戶末期至明治初期日本填詞的興盛奠定了基礎。江戶時期詞學書籍的傳入與流通，甚至是和刻本的出現，不僅反映了當時文人的閱讀品味，也意味著這些書籍在流通、傳閱與翻刻方面已有相當的需求。¹⁰¹ 江戶晚期日本書商所編修的《彙刻書目外集》，詞學類僅收錄了《詞學全書》一事，亦是此書在當時廣泛流通的表徵。此外，明治大正時期的文人如森川竹磯（1869-1917）與久保天隨（1875-1934）的著作中，亦可見《詞學全書》的深遠影響。

誠然，江戶時期的漢文學主流始終以詩文為核心，詞體則以「詩餘」的附屬地位被文人認識與接受。漢籍東渡不僅促進了知識的傳播與交流，也讓向來被視為小道的詞體隨著時代風潮傳至域外，並經歷了獨特的接受與發展過程。江戶文人對詞體的逐步認識與接受，為學者提供了明清詞學之外的對照線索：觀察在詞樂佚失的背景下，異國學人如何通過漢文文本理解與詮釋詞體。作為一部系統性的詞學著作，《詞學全書》的傳入擴大了江戶文人接觸詞學與學習填詞的知識基礎。通過考察此書的性質、傳入過程及其接受狀況，可約略勾勒出江戶時期詞學接受的脈絡，並進一步探討文人對詞體認識的轉變。有助於理解江戶時期詞學發展軌跡之餘，也為明治、大正時期日本詞社興起與詞人大量填詞的現象提供了重要的前緣背景。

101 長澤規矩也（1902-1980）的《和刻本漢籍分類目錄》記載明治刊本的《鷗夢吟社叢書》中有《花草蒙拾》、《詞統詞源》、《靈芬館詞品（筆者案：「品」疑為「話」之誤）》、《芬陀利室詞話》等詞籍詞話之和刻本。（日）長澤規矩也，《和刻本漢籍分類目錄（增補補正版）》（東京：汲古書院，2006），頁 221。

引用書目

一、傳統文獻

- 明·吳訥編，《文章辨體外集》，東京：國立公文書館藏嘉靖刊本。
- 明·李廷機編，《新刻註釋草堂詩餘評林》，東京：國立公文書館藏明萬曆三十六年（1608）起秀堂刊本。
- 明·胡應麟著，江湛然編，《少室山房筆叢續乙部·藝林學山三》，東京：國立公文書館藏明刊本。
- 明·錢允治輯，《類編箋釋國朝詩餘》，收入續修四庫全書編纂委員會編，《續修四庫全書》第 1728 冊，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2。
- 清·永瑤等著，《四庫全書總目提要》，上海：商務印書館，1931。
- 清·查繼超輯，吳熊和點校，《詞學全書》，北京：書目文獻出版社，1986。
- （日）林靖（讀耕齋）著，林憲（晉軒）編，《讀耕林先生文集》，米澤善本，寬文九年（1669）刊本。
- （日）向榮堂主人輯，《唐本類書考》，東京：早稻田大學古典籍綜合資料庫藏，寬延四年（1751）京都山田三郎兵衛出版。
- （日）隨緣道人口說、天心筆記，《典籍概見》，東京：早稻田大學古典籍綜合資料庫藏，寶曆四年（1754）出版。
- （日）犬塚遜，《昌平志》，東京：日本國會圖書館藏文政元年（1818）寫本。
- （日）松澤老泉，《彙刻書目外集》，江戶：慶元堂，1820，早稻田大學古典籍綜合資料庫藏。
- （日）佐藤一齋，《初学課業次第》，東京：國立公文書館藏，天保三年（1832）出版。
- （日）大分教育廳管理文化課編，《田能村竹田資料集·詩文篇》，大分：大分縣教育委員會，1992。
- （日）大分縣史料刊行委員會，《大分縣史料第 22》，大分：大分縣立教育研究所，1960。
- （日）田中慶太郎編，《文求堂輸入唐本目錄》，東京：文求堂，1906。
- （日）長崎縣史編纂委員會編，《『長崎県史』史料編第 4》，東京：吉川弘文館，1965。
- （日）梅園會編，《梅園全集》，東京：弘道館，1911。
- 域外漢籍珍本文庫編纂出版委員會編，《域外漢籍珍本文庫》第 4 輯·史部第 23 冊，重慶：西南師範大學出版社，2014。
- 彭志輯校，《明人詞籍序跋輯校》，杭州：浙江大學出版社，2021。

二、近人論著

- (日) 大田南畝原編, 川瀨一馬編校 1953 《南畝文庫藏書目》, 東京: 日本書誌學。
- (日) 大庭脩 1967 《江戶時代における唐船持渡書の研究》, 吹田: 關西大學東西學術研究所。
- (日) 大庭脩編 1972 《宮内廳書陵部藏: 舶載書目附解題》, 京都: 同朋舍。
- (日) 大庭脩 2003 《日中交流史話——江戶時代の日中關係を読む》, 大阪: 燃燒社。
- (日) 久保天隨 1903 《支那文学史》, 東京: 人文社。
- (日) 山田英太郎編 1909 《昌平叢書目錄》, 日本國會圖書館藏書。
- (日) 山根安太郎 1966 《国語教育史研究: 近代国語科教育の形成》, 廣島: 溝本積善館。
- 王德威 2017 〈現代中國文論芻議: 以「詩」、「興」、「詩史」為題〉, 《中國文化研究所學報》65(2017.7): 285-309。
- (日) 木崎好尙 1930a 《大風流田能村竹田一》, 東京: 民友社。
- (日) 木崎好尙 1930b 《大風流田能村竹田六》, 東京: 民友社。
- (日) 古田東朔 1956 〈江戶期漢学學習方法覚書——「初学課業次第」をめぐつて〉, 《國語科教育》3(1956): 35-55。
- (日) 永積洋子 1987 《唐船輸出入品数量一覽: 1637-1833年: 復元唐船貨物改帳・帰帆荷物買渡帳》, 東京: 創文社。
- (日) 池田四郎次郎、濱野知三郎、三村清三郎編 1928 《日本芸林叢書》第4卷, 東京: 六合館。
- (日) 村越貴代美 2019 〈田能村竹田の詞論: 《填詞圖譜》を中心に〉, 《慶應義塾大學日吉紀要・中国研究》12(2019): 79-118。
- 周健強 2019 〈江戶時期中國小說傳播的階段特徵——以《舶載書目》為中心〉, 《中國文化研究》2019.1(2019.2): 169-180。
- (日) 林衡口授, (日) 左藤坦記 1917 《初學課業次第》, 《江戸》6.4(1917.8): 57-82。
- (日) 青木正兒 1948 《支那文学芸術考》四版, 東京: 弘文堂書房。
- (日) 長澤規矩也 2006 《和刻本漢籍分類目錄 (增補補正版)》, 東京: 汲古書院。
- (日) 松下忠著, 范建明譯 2008 《江戶時代の詩風詩論——兼論明清三大詩論及其影響》, 北京: 學苑出版社。
- (日) 柏崎順子 2009 〈高橋華陽〉, 《言語文化》46(2009.12): 41-55。
- (日) 神田喜一郎著, 程郁綴、高野雪譯 2000 《日本填詞史話》, 北京: 北京大學出版社。

- (日) 荒野泰典、石井正敏、村井章界編 2010 《近世の世界の成熟》，東京：吉川弘文館。
- (日) 高山節也編 2012 《國立公文書館內閣文庫『林家書目』漢籍對照表並書誌》，東京：二松學舍大學日本漢學研究推進室。
- (日) 高野辰之 2023 斑山文庫，「點滴拍賣」，<https://www.qudiandi.com/product/item/pid/10000473.html> (2023.11.22 上網檢索)。
- 孫楷第 1957 《中國通俗小說書目》，北京：作家出版社。
- 張仲謀 2008 〈論徐師《詞體明辨》的詞譜性質——兼論《嘯餘譜》與《詞體明辨》之關係〉，《西北師大學報（社會科學版）》45.5(2008.10): 51-56。
- 張伯偉、卞東波 2017 《風月同天：中國與東亞》，南京：江蘇人民出版社。
- 章宏偉 2019 〈長崎貿易中的清宮刻書——以《舶載書目》為中心〉，收入劉再聰主編，《中西交通與華夏文明》，北京：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頁 605-626。
- 陳水雲 2022 〈被折疊的詞史段落：康熙末至乾隆初的浙西詞派與浙西詞壇〉，《嶺南學報》16(2022.12): 34。
- 陳水雲 2024 《清代詞學觀念史論》，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
- 陳竺慧 2021 〈昌平坂學問所における舶來詞籍の受容〉，《待兼山論叢·文學篇》55(2021.12): 1-23。
- (日) 猪飼敬所 1928 《猪飼敬所先生書東集》，收入(日) 池田四郎次郎、濱野知三郎、三村清三郎編，《日本芸林叢書》第 4 卷，東京：六合館。
- 馮佐哲 2001 〈乍浦港與清代中日貿易和文化交流〉，收入朱誠如、王天有主編，《明清論叢》第 2 輯，北京：紫禁城出版社，頁 245-263。
- 靳春雨 2022 〈新見日本經學家佐藤一齋詞六首考述〉，收入金程宇編著，《域外漢籍研究集刊》第 24 輯，北京：中華書局，頁 141-154。
- (日) 萩原正樹 2017 《「詞譜」及び森川竹磯に関する研究》，京都：中國藝文研究會。
- (日) 福井保 1985 《江戸幕府刊行物》，東京：雄松堂。
- (日) 福井保 2016 《內閣文庫本考證》，東京：青裳堂書店。
- 劉序楓主編 2018 《亞洲海域間的信息傳遞與相互認識》，臺北：中央研究院人文社會科學研究中心。
- 劉宏輝 2020 《詞學文獻東傳與日藏詞籍》，北京：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
- (日) 稻葉岩吉編 1912 《朱舜水全集》，東京：文會堂。
- 羅苑翎 2017 〈江戸時期明清艷情小說之傳入及其閱讀性質——以《如意君傳》和刻本、通俗本、考證本為例〉，《漢學研究》35.4(2017.12): 237-265。

(日) 藤田優子 2020 〈《花草粹編》における白話小説の利用——明代詞籍の刊行を可能にしたもの〉, 《明代における詞の受容: 文字の文学と音の文藝》, 東京: 汲古書院, 頁 139-172。

嚴紹盪 2021 《日本文化研究》, 北京: 北京大學出版社。

Capasso, Danilo. 2024 〈昌平坂學問所藏書目録の編纂事業に関する一考察: 『官庫書籍目録』及び『昌平鬘公借書目』を中心に〉, 《藝文研究》126(2024.6): 66-79。

**The Introduction and Reception of Ming and Qing
Ci Poetry in the Edo Period (1603-1868):
A Study on *Cixue Quanshu* (*Complete Collection of
Studies on Ci Poetry*)**

Yu Jia-yun*

Abstract

The present article discusses the dissemination and reception of the early Qing dynasty literary work *Cixue quanshu* 詞學全書 (*Complete Collection of Studies on Ci Poetry*) during the Edo period in Japan, exploring its influence on the Japanese *ci* 詞 poetry scene. It begins by summarizing the background of the importation of Chinese books at that time, particularly Ming and Qing *ci* works, with *Cixue quanshu*, as the most influential, being highlighted. It then analyzes existing materials on said imported Chinese books, explaining the circumstances surrounding the importation of *Cixue quanshu* as well as its evaluations and recognition by scholars such as Miura Baien 三浦梅園 (1723-1789). Furthermore, by observing the reading of *Cixue quanshu* within the official academy Shōhei-zaka Gakumonjo 昌平坂學問所 and its transformation into a foundational aspect of Han studies, it expounds the gradual acceptance of *ci* forms among literati. An examination of the reception of *Cixue quanshu*, a comprehensive guide to *ci* poetry knowledge and composition, thus enables us to apprehend one aspect of the development of *ci* poetry studies in the Edo period, serving as a precursor to understanding the flourishing of the Japanese *ci* poetry scene from the Meiji and Taishō periods onward.

Keywords: *Cixue quanshu*, *Complete Collection of Studies on Ci Poetry*, Edo period, *ci* poetry collections, acceptance of *ci* poetry, the importation of Chinese books

* Yu Jia-yun, Associate Professor, Department of Chinese Literature, National Chung Hsing University.